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40期

【探索与争鸣】

2/如何走出“预谋论”

——从“文化革命”的视角/吴一庆（加）

【百年国史】

16/爸爸的遗愿

——1957年河南省“潘杨王”案起源内幕/于向真（新加坡）

30/附录：1957年河南省“潘杨王”案/杨继绳《墓碑》摘选

54/绘本特殊年代——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十一）/墨娃

【书讯】

63/纵纬著《毛泽东的政变——文革简史》英译本在亚马逊上市

63/作者小传·本书目录

69/丁东、邢小群著《士林剪影》在博登书屋出版

【序跋】

73/《士林剪影》自序/丁东 邢小群

75/《毛泽东的政变——文革简史》前言/纵横

【评论】

77/旁观新加坡国会辩论

——我眼中的新加坡（7）/于向真（新加坡）

79/“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81）/李南央（美）

【怀人】

82/朱陆真/张保和（美）

【书摘】

91/刘瑜：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本刊声明】

【探讨与争鸣】

如何走出“预谋论” ——从“文化革命”的视角

吴一庆（加）¹

樊建政、董国强的大作《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斗鬼”风潮》（《二十一世纪》杂志2022年6月号、8月号分上、下两篇发表，以下简称《斗鬼风》）是新近海内外文化大革命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² 文章通过考察1966年春夏之际复旦文革运动的曲折演进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复杂互动与张力关系，对于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斗鬼风》以复旦文革初期作为个案，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毛泽东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以挑战党国机器及官僚阶层，但为何“反动学术权威”“黑鬼”却在文革初期成为主要打击对象？如何理解1966年6、7月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权威”以及“黑帮”为对象的一场新的“反右”运动？这是文革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主流解释看来，这是由于各级干部误解或曲解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打击党内走资派和当权派的真实意图，蓄意以“矛头朝下”“矛头朝（党）外”替代“矛头朝上”“矛头朝（党）内”，从而达到转移目标和政治自保的目的。在樊、董二君看来，这一解释存在重大问题。他们认为，各级党组织主导的新一场“反右”运动并非阳奉阴违、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而是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及正确理解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所规定的运动主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见地、具有潜在突破性意义的新颖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樊、董大文质疑和挑战文革研究领域极为广为流行的毛泽东与中共最高层发动文革的“预谋论”（或称“阴谋论”）观点。他们提出“‘预谋论’的历史错觉”之所以盛行，其原因是过往学者大多忽视文革过程中的不确

¹ 作者简介：吴一庆，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研究方向与兴趣为文化大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比较社会主义历史、革命与社会运动等，其专著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获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加拿大历史学会最佳著作提名奖。

² 两位作者关于文革的几篇重磅作品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杂志，见《“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黑材料”风潮》（2016年第6号）、《上海“反复辟学会”：一个“文革”时期社会思潮个案》上、下篇（2019年6月号、8月号）。

定性和变动性以及不同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张力转换，从而导致毛泽东的个人意旨往往成为政治运动中的“唯一评判标准”，而“基层党组织却无从置喙”（上篇，第88页）。

笔者认为，《斗鬼风》在基本观点的陈述和论证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以下三方面问题求教于二君及各位学界同仁。

关于“预谋论”

笔者以为，《斗鬼风》一文把文革发动的所谓“预谋论”或“阴谋论”作为主要质疑对象，似有偏题之嫌，文中所使用的“预谋论”概念的涵义亦有重大模糊之处，因而导致文章叙述与论证的聚焦不够清晰、精准。

倘若说文革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预谋论”解释的话，读者的理解无疑是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谋及其实施过程。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绝大部分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以整肃党国体制及其领导阶层的一场运动，源始于他的权力欲以及激进政治理念。最高领袖及其追随者密谋于暗室，逐步将斗争从高层推向基层，最后将熊熊大火烧到全国。近半个世纪来，这一文革发源与发生学的经典范本久已泛化并固化为史界常识，无论是二君文章所指名批评的西方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又名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或如严家其、王年一、卜伟华、杨继绳等知名中国学者，其著作均持类似观点。例如，英语学界最富威望的文革史家、已故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在其三卷本经典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把文革发动的复杂历史描绘为一场以毛泽东为剧作者和总导演的大戏中的不同场景：

序幕：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11月），打响发动文革的“第一炮”；

第一幕第一场：发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5月底），将高层政治转化为群众运动；

第一幕第二场：毛泽东游长江（1966年7月中旬），直接向青年人发出动员令；

第一幕第三场：撤销工作组，直接掌握运动领导权（1966年7月下旬）；

第一幕第四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颁布《十六条》，发布《我的一张大字报》，贬斥刘少奇（1966年8月初）；

第二幕开始：发起全国性的红卫兵造反运动（1966年8月）。³

马氏借用戏剧的概念，通过剧中的“场”“幕”组织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使得发动文革这场大戏的每一个步骤，都反映了毛泽东预先精心构想的谋略或蓝图。近年来，此类“预谋论”的观点与解释逻辑在秦晖先生于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发表的一篇长篇论文中被推演至极致。该文提出，1960年前期和中期，毛泽东感到同时面临分别来自党国官僚阶层以及下层民众两方面的威胁，他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玩了一场“历史上一般的独裁者都没有玩过的游戏”（第8页）。毛泽东“居高临下煽动和操控政要和民间互斗”（第10页），设计让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可疑分子互咬，左右手互搏，一方面鼓动基层民众冲击官僚，另一方面又支持官僚镇压民众。最高领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从官僚手里解放了受压的民众，又从民众造反的威胁下解救了官僚，所有异己都被铲除，而毛自己则在两头都可以扮演至高无上的“大救星”的角色。⁴

然而，《斗鬼风》所质疑的“预谋论”除指向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最高层外，亦另有所指，即文革初期由各级基层党组织所主导的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残酷打击，以及此种抉择与行为是否构成有意而为之的“转移斗争大方向”（下篇，第109-111页）。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预谋”和基层党委是否“蓄意”转移斗争目标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不可轻易混为一谈。就文革初期基层党委的政治角色和行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做法有无“预谋”或是否是出于有意“转移斗争目标”的目的。事实上，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打击旧知识分子和“黑鬼”并非偶发或无计划之举，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此举至少在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转移目标和规避政治风险的效果。

³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Vol.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461-62.

⁴ 秦晖：《“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二十一世纪》，2016年8月号。

与“预谋论”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叙述层面与解释路径，即高层与基层、宏观与微观之关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预谋”和基层党委是否蓄意转移斗争目标，分属于高层决策和基层理解与执行的两个不同层面。笔者认为，反思与重构有关文革发动的阐释需从高层与基层、宏观与微观之互动以及长时段等多维度入手。《斗鬼风》着眼于单一基层个案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此类微观研究无疑具有巨大启示意义，但同时又恐难充分承纳其所担负的重要任务。《斗鬼风》一文的主要贡献是详尽梳理出了复旦大学文革发动过程中的各种复杂事态，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关于所谓的“预谋论”的批评。有资格“预谋”文化大革命的只能是在中央最高层，发动文革也只能是毛泽东可以“预谋”。基层党组织如复旦大学党委，中层如上海市委乃至华东局，根本就谈不上参与“预谋”。《斗鬼风》用微观的基层个案来质疑、挑战原属高层、宏观层面的“预谋论”，这是文章的基本短板所在，似有逻辑错位之嫌。笔者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好比目的地是罗马，但却南辕北辙地走了去耶路撒冷的道路，结果绕了一个大弯。

《五一六通知》再释

如上所述，《斗鬼风》一文用基层个案来讨论高层的“预谋论”问题，这是走错了路径或戴错了帽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预谋论”的叙事不应受到严肃的质疑乃至强有力的挑战。笔者认为，唯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更为详尽、系统地梳理并准确地理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最高层发动文革的原初意图，才能真正打开新的历史叙述和阐释空间。

《斗鬼风》认为复旦文革初期的“打黑鬼”或新型“反右”运动并非基层干部“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个观点对流行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传统文革史叙述看来，《五一六通知》（下文简称《通知》）认定“党内走资派”是文革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但各级党委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只能通过“转移斗争方向”来应付自保。例如，马若德和沈迈克在其权威文革通史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未能被人们理解，从而导致运动初期的斗争对象以专家学者居多。⁵ 王

⁵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1, 67. 很值得一提的是，文革运动打击目标的重点“‘在内、在上’”这一提法其实并非出自于毛泽东亲自审定并修改的《五一六通知》，而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林彪在5月18日的政治局扩

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出，在文革初期，各级党组织（包括他们派出的工作组）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主导批斗“反动权威”，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又受了毛的一些“概念不清、界限不明”的言论的影响。⁶ 杨继绳先生的叙述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毛泽东把整当权派作为文革的重点，而各级当权派却发起抵抗，将斗争矛头转向知识分子、普通群众以及官员群体中的异己分子，自上而下地揪出一大批牛鬼蛇神和所谓右派分子。虽然共产党历来一贯这样做，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越轨了，官僚们的常规做法，“和毛的战略是针锋相对的”。⁷ 马若德、沈迈克、王年一、杨继绳等人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樊、董二君对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提出新的解读，偏离了学界的传统理解。他们认为，《通知》所指明的斗争对象并非只是一个，而是两个，即“反动权威”与“党内当权派”并列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运动的矛头同时指向“上”“内”或“下”“外”（下篇，第109页）。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观点。然而笔者以为，二君对《通知》提出的新解释，寥寥两三行，在叙述、论证和分析方面皆过于粗略，观点亦不够鲜明、准确，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无论是文革期间的官方言论，还是文革后的海内外学界，都毫无例外地一致认定《通知》是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是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混进党、政、军内部，只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夺回被阶级敌人篡夺的权力。这些论点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通知》则浓缩表达了这一理论。⁸ 长期以来，这一文革史领域最核心的观点以不同形式出现于各种权威叙事中。然而，此处的关键问题是：《五一六通知》所标志发动的文革，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

大会议上谈到刚刚发动的文革运动时说：“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随即重复了这一说法。见《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关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笔者将另撰文论述。

⁶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43页。

⁷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天地图书公司，2016），上册，第200页。

⁸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第22页。

笔者以为，学界关于《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发动问题的常识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也不充分反映《通知》文本的主要内容。首先，《通知》在当时并不是公开的大众动员性文本，⁹而且，通过“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以打击“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也不是《通知》的主题。实际上，《通知》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其主题是批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定的《二月提纲》所代表的相对温和、有序、可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路线，正文和附件中提到彭真的名字多达九十四次。《通知》用大量篇幅批判《二月提纲》，列举其多条罪状，并逐一批驳。《通知》要求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从而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激进文化运动采取组织性措施。

《通知》提出一整套关于激进意识形态运动或“文化革命”的理论和方针，其形成之具体历史与政治语境是1960年代中期日趋激烈的文化领域的批判与斗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详见后文及笔者拙文《被忽视的“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再探》，将刊出于《二十一世纪》杂志）。《通知》对1949年后文化领域的基本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牛鬼蛇神“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这一概括完全抹杀了中共建国后文化战线上的成就，认为文化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强调，要批判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泽东在《通知》最后加写的这些措辞尖锐的话，后来成为人们理解和叙述文革发动的主要依据：“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多人把这些话当作毛泽东要将矛头指向中央最高层乃至刘少奇的证明，但这并无充分根据。¹⁰

⁹ 《通知》在当时是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到的党内机密文件，见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41. 尽管《通知》的主要内容很快以各种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并起到大众动员的效用，但全文却在一年之后才公开发表。

¹⁰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详细叙述。

笔者认为，文革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五一六通知》一直存在一种基本的错误理解，即将1966年8月份颁布的《十六条》的主题投射或叠加在5月份的《通知》之上，从而将两个无论从语境或内容来看都有显著差异的文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通知》中只出现过一次，且有其明确的具体指称和限定，即“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明显指的是彭真等推行或纵容相对温和的文化政策的干部，他们被视作激进“文化革命”的政治障碍，是一场激进的意识形态运动或“文化革命”（见下文）必须打击的对象。正如毛泽东所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里有人”，“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搬掉绊脚石才能前行。¹¹因此，《通知》规定的打击对象主要是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附加上那些“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派”。也就是说，《通知》所规定的斗争对象，事实上并非如樊、董二君所言存在矛头“朝下”和“朝上”“朝外”和“朝内”两个同时并列的目标，二者不是并排关系，而是先后关系。准确地说，《通知》的斗争目标只是一个多一点，或者最多一个半。

如何超越“预谋论”——“文化革命”的视角

如前所述，在文革研究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预谋论”将文革的发动叙述为反映作为剧作者和总导演的毛泽东的精心构想的环环相扣、连续展开的一场大戏。但是，好戏或好故事未必同时也是好历史。笔者认为，上述叙事范式至少不得不面对一些难以圆满解释的关键问题。例如，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文化”究竟意指什么？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冲击党国官僚机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大革命，却为何始于一场文化领域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开端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并非没有学者注意到，但很少有人认真加以关注。胡绳主编的权威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写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认为党内包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过去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全面、自下而

¹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80页。

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而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的名称，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而“‘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¹² 此类一笔带过的写法在文革研究领域相当普遍。

在大部分关于文革发动的历史叙述中，权谋大师毛泽东及其激进派追随者的目的是打击控制国家政治中心的彭真和北京市委，继而打倒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文革初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斗争仅仅是策略性的突破口。王年一先生的未刊旧作《“文化大革命”八十问》是一个例外。他在“第十三问”中提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但他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在援引黎澍先生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旧文（1986年9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里所言：“1966年开头恐怕是想把运动范围框在文化之内，革文化的命”之后，又重新设问：“这种说法是否正确？”¹³ 王先生的提问，反映了一位前辈史家的直觉疑虑。但不无遗憾的是，他并未对此深入考察。陈兼先生在新著《怎忍青史近成灰：文革政治史批判笔记》中也提到文化问题与文革发动的关系，他指出，毛泽东“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路数，由江青担任大将，开始大搞文化、文艺界的‘革命化’运动，使之成为走向文革的一个直接入口”，¹⁴ 但仅是提及而已，并未扩展讨论文化“革命化”作为文革“直接入口”的具体意义与过程机制究竟为何。值得一提的是，樊、董二君在《斗鬼风》文章开头亦提及文革初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将之称为“小文革”（上篇，第89页），但也是仅点到为止，未有详细叙述和系统挖掘。“文化革命”以及“大”“小”文革之类的富有高度历史张力的原创性概念，在二君后文中基本消失，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再造历史叙述、建构新颖观点的重要作用。坦率地说，作者似乎并未充分理解其所蕴涵的潜在创新意义，从而踏在新范式的门槛上，却临门不破、过门而不入，以至于没有把握住触手可及的突破旧有理念、拓展新的历史叙述与阐释空间的机会，这是甚为令人遗憾的。

¹²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422页。

¹³ 见王年一，《“文化大革命”八十问》，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highlight=%B0%CB%CA%AE%CE%CA>

¹⁴ 陈兼，《怎忍青史近成灰：文革政治史批判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第47页。

前述文革发生学的经典叙事存在重大罅漏，它难以圆满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比如，文革前夕和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很难与1966年8月后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造反运动发生密切关联。文革始于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不争的事实，但难以证明这是毛泽东发起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谋划或策略性准备。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发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进“文化革命”正是毛的初衷和本意。¹⁵ 毛泽东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决意阻击经济领域中的去激进化趋势以及社会、文化领域里尚处萌芽状态的偏离革命意识形态的倾向。大跃进运动失败后至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于文艺、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势日趋不满，将一场文化领域的激进运动即“文化革命”视作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的良方妙药，以期回归大跃进期间的激进文化和重振延安年代的革命文化传统。1960年代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包括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等在内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中共文宣部门领导人，多次声称要用“赶”的激烈手段来冲击和改造陈旧僵化的知识界和文化领域。¹⁶ 对于文艺界和文化领域的种种弊端，毛泽东认为他本人作为党的领袖负有失察的责任，自责“糊涂”“不高明”“搞了十五年还没有搞好”。¹⁷

毛泽东强调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是出于他对文教界情况的判断，二是基于他对知识分子日益负面的看法。长期以来，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信任。到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不仅从思想角度来讲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更越来越强调他们曾服务于旧社会、旧政权的历史污点及其现实危险性。1964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拉丁美洲学生代表团时指出，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¹⁸ 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老挝文工团时说，我们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我们现在要改正错误，

¹⁵ 详见笔者文稿《被忽视的“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再探》，将刊于《二十一世纪》。

¹⁶ 例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就文教问题发表讲话，声称“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94页）。

¹⁷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时的谈话》（1964年9月4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177页。

¹⁸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168页。

要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¹⁹ 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亚非文学座谈会的亚非作家谈话时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就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作坏人”。

20

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频频表述类似的严苛判断和激进看法。他对文教领域不仅失去信心，且已失去耐心。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²¹ 5月5日，毛泽东在宴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我们的大学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毛泽东认为要果断采取行动，他提出了著名的“剥笋”政策，说对于隐藏的“坏人”要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²² 在毛看来，知识分子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这是中共建政以后文教领域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因而需要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予以强有力的冲击和彻底的改造。

从1966年春起，向来关注文化问题的毛泽东开始频繁使用“文化革命”及类似概念。3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江青递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加写了以下的话：“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

¹⁹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1964年9月4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177、179页。

²⁰ 《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1964年12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203页。

²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5页。

²² 《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宋永毅编：《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国史出版社，2018），第113页。毛此处所言的“剥笋”除去指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被清洗的政治人物外，显然也包括文教界中大批不可靠的“旧人”“坏人”。

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²³

在1966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²⁴ 3月20日，毛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²⁵ 杭州会议是“文化革命”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毛泽东决意发起一场更为激进的“文化革命”以反击和取代彭真和中央文宣部门领导的有组织、有序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毛泽东认为文艺、教育、学术等文化界的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他决意采取行动，发动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规模斗争，即“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新成立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如前所述，《通知》形成的具体语境是文化领域的批判与革命，其指向性非常明确，主要内容是批判以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为代表的较为温和的“文化革命”路线。1966年初夏，一场思想、文艺、学术领域中的大规模斗争即激进“文化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权威”“黑帮”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换句话说，文革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是毛泽东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炮打“党内当权派”和党国官僚机构的政治大革命，而是一场以旧知识分子、党内文教官员为主要打击对象、以意识形态斗争及文教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为主旨的激进“文化革命”，亦即樊、董二君所说的所谓“小文革”。

²³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03页。

²⁴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257-258页。

²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8-569页。

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正是持这种看法。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北越领导人胡志明，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毛还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²⁶ 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²⁷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中共最高层和官方舆论对于文革运动的理解和说法便发生了重大变化。1966年8月8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同为文革运动全面发动的正式标志和纲领性文献，这两个文本之间既存在基本的连续性，但亦有显著差别。《十六条》的颁布是文革运动发生重大转向的风向标。尽管《十六条》与《通知》在激进“文化革命”方面有着基本的连续性，但这两个文件却反映了明显不同的文革观。与《五一六通知》相比，《十六条》对文革运动的目标、对象和方法的规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从“矛头向下”转为“矛头朝上”：运动的重点从斗争“黑帮”“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牛鬼蛇神”，转向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已然超出文教宣传领域，革命对象从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扩展到“党内走资派”，借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话，即“以共产党自己为革命对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²⁸ 另外，《十六条》在运动的方式方法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十六条》强调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引入以群众自我组织、自我革命为特征的激进政治想象。通过《十六条》的表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具备了“大革命”或“大民主”

²⁶ 《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²⁷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417页。

²⁸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第421页。

的政治涵义，即“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十六条》发布后，文革运动的“文化革命”主题日趋淡化，而逐渐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清党”运动，各级“当权派”成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令人费解的是，《五一六通知》与《十六条》这两份纲领性文献之间的基本差异，多年来却一直未为学界注意。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转向的基本面向。林彪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旨在彻底清理干部队伍的“三个全面”和“三个罢官”的运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通过考察干部，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罢官；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罢官；没有革命干劲的，罢官。林彪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并披露毛泽东已同意这一构想。²⁹大致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的说法也有了显著的变化。9月15日，毛泽东在修改林彪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了一段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特性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³⁰显然，此时的毛泽东已把文革理解为一场以“炮打司令部”即打击党内当权派为首要目标的一场大革命，而几个月前官方话语所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主题，在毛泽东亲笔加写的这段文字里却消失了，其中意味值得深思。³¹

结语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七十三岁生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参加寿宴。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

²⁹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³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35页。

³¹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下半年“文化革命”主题逐渐淡出，当时曾有不少人表示不解甚至不满。1966年11月，江青在一次大会上回应群众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文艺与文化界关注不够的问题时说，“因为注意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对文学艺术界的具体工作，就抓得少了”。她向群众致歉：“我希望得到你们的谅解。今后，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注意你们的问题，我不敢说。因为斗争的领域太宽广了。对于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破与立的问题，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专门搞了，这可能要等到运动的某个段落”（〈陈伯达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部攻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市场。席间毛泽东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³²

从1966年春夏之际的一场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为主要斗争对象的激进“文化革命”或所谓“小文革”，到同年盛夏中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三个全面”“三个罢官”的大清理和大清洗，再到年末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文革运动在从1966年上半年起的大约半年内经历了明显变化。1966年春夏之际毛泽东发动的激进文化运动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性文本，然而，这场“文化革命”和1966年下半年以《十六条》为标志的、以打击“党内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笔者认为，这一充满复杂张力与曲折变化的历史进程，显然不能单纯地归因于毛泽东原初意图的连续性展开和实现。如果借用前文所述的马若德的戏剧比喻，文革发动这一充满曲折张力与复杂变化的故事或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但它们未必能够依照毛泽东的“预谋”拼合为一场完整的大戏。回到“预谋论”的问题，倘若说上半场是毛泽东“预谋”的话，那么，下半场则很可能是出于包括最高领袖个人意志在内的多种不同力量互动、碰撞、融汇所产生的未可事先预知的结果。

33

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个很不缜密的历史概念。我们不应因为上、下两半场“文革”的称谓相同，就断定它们的历史内涵也一定相同。作为对于事件的命名，“文化大革命”的背后其实包涵了密切联系但非常不同的历史与政治内容及其多重变动轨迹，其差异性与多质性常被概念标签的同一性所遮蔽。此处有一个富有重要方法论涵义的问题：我们不能仅因为语辞名称类似，便理所当然地以为背后所指称的就是同一实体。乔治·奥威尔曾在其名篇《政治与英语语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告诫世人，“最糟糕的事情无异于向文字举械投降”（the worst thing one can do with words is to surrender to them），这无疑同样适用于史学实践。史学家对于历史范畴自

³² 《王力反思录》，上册，第202-203页。

³³ 笔者将在英文专著 *The Coming of Mao's Last Revolution: How a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m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毛泽东的最后革命的降临：一场“文化革命”何以衍变为“政治大革命”》）中详细检视文革初期这一充满复杂张力与曲折矛盾的蜕变过程。

身的历史性（historicity）应保持高度敏感，就史学方法论而言，这是破解“预谋论”之谜思的关键。

笔者认为，唯有详尽、系统地梳理并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初意图，并将中共建国后以意识形态领域为主要对象、盛行于大跃进期间并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新一轮高潮的长时段的激进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the “long cultural revolution”）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于我们久已熟悉的“文革”或“文化大革命”概念的史学叙述与分析范畴（historiographical category），樊、董二君文章关于复旦文革初期的微观个案的新颖意义，才能充分展现。不无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斗鬼风》一文叙事和论点结构的短板所在。换言之，只有从宏观层面把“文化革命”梳理清楚，才能将基层微观案例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以考察其各种复杂交织与互动关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才能得以真正拓展以原创性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历史叙述与解释空间；只有如此，从作为激进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到作为群众性造反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之转化，其中所涉及种种复杂张力与曲折演进，才有充分展示之可能。无论从史料抑或分析角度而言，这是能够有力质疑及超越文革史研究中广为盛行的“预谋论”的要害所在。■

【百年国史】

爸爸的遗愿

——1957年河南省“潘杨王”案起源内幕

于向真（新加坡）

2019年春节前一天，几位以前在博联社发博文的老朋友在北京小聚餐叙。那次我与从凤凰网副总岗位上退休的乔海燕邻座，他对我说“我妈妈念叨过几次了，有事要当面对你说，你抽空去看看她吧。”乔海燕的父亲周原、母亲陈健与我父母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陈健阿姨找我有何事？当时我和老伴儿正准备去新加坡帮助带娃，离京前抽空去陈健阿姨家看望她，意外地听到发生在1957年党内斗争的一件旧案——河南省当时的省长将省委书记定为“潘杨王反党集团”，二把手出面扳倒一把手并取而代之。这件旧案困惑了党史专家，明显不合常理却理不清头绪，2019年我去看望陈健阿姨，无意间窥见了序幕拉开时的一件秘闻，

前因后果间多出一个隐藏着的环节。



2019年3月，我给90岁的陈健阿姨拍的一张照片。



2019年3月，我用手机在陈健阿姨家自拍了一张我和陈健阿姨的合影。

陈健阿姨叫我来是有事相托：早在2003年秋天，我爸爸于明病重，自知不久人世，把一件沉积心中的旧事托付给文笔好、住家近的老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阿姨，请求她帮助自己把一件未了之事写成文字留给后人。哪知16年后，陈健阿姨感觉自己无法完成朋友所托，开始数次催促儿子找我，于是那个似轻还重的历史包袱经四次传递，突然交到第五人我的手里，烫呼呼的捂着，至今我还没能再传递出去。怎么办呢？我先如实用文字记录下来吧。

我去见陈健阿姨听到的原话是：1957年初春，当时的主政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密召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进京，两人密谈，邓告诉吴：中央认定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是反革命，决定将“潘杨王”集团扳倒，邓面授机宜让吴揭发批判潘复生等人的错误言行，中央随后公布对潘杨王集团的定性，三人将被撤职被调离，吴芝圃将被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回河南后，照办了邓指令，河南省也大张旗鼓开展反右运动，成为人民公社的发起者和大跃进的急先锋。由此引发的大饥荒令吴芝圃转胜为败，惶惶无奈中，他把1957年初春的邓与他密谈之事告诉我爸爸于明，并郑重嘱托“只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件事，你要用文字如实保留下来。”那些年，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这件事被我爸爸埋藏心中，从未提及。我爸爸离休后，又是邓小平主政，此事更无法碰触，直到临终前才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她让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人。”16年半之前爸爸对她说的“原话”又传给了我。

这件1957年初春邓小平密诏吴芝圃，一对一告知“党中央决定”；吴照办害人害己，几年后，吴芝圃一对一嘱托我爸爸于明“用文字如实记下来”；2003年秋我爸爸病重，让我妈妈叫来陈健阿姨，一对一托付“写成文字留给后人”；2019年3月在陈健阿姨家又一对一传递给我。

事关1957年“潘杨王”案起源的内幕，历经几十年，经手五人：邓小平、吴芝圃、于明、陈健、于向真，四次一对一传递。时隔久远，下面我从梳理当事人关系着手，帮助读者理解这一历史悬案。

吴芝圃与于明的关系

第一当事人邓小平，我不必介绍，从第二人吴芝圃说起。1926年，毛泽东

在广州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吴芝圃（后来的河南省委书记）领着几位早期中共党员到广州参加交流与学习，结识了讲习所老师毛泽东，从此吴对毛尊称老师，一辈子恭敬顺从。尽管在学术界有吴芝圃曾经在毛泽东面前“掉书袋”引用古书言辞卖弄才学的传言，但熟悉吴芝圃的人都知道，吴“从没违逆过毛旨意”。作为长女，我听爸爸于明说过“他在毛面前，永远一副学生样儿”。

2006年深秋一天，我老伴儿开车接上二姐吴永杞、二姐夫李祥义，我们四人再次去西山干休所看望退役将军徐树森，徐叔叔是吴芝圃的杞县老乡和老部下。那之前北京刚开过“吴芝圃诞辰百年座谈会”，我陪妈妈去参会，听到十多名新四军老人对吴芝圃的功绩、学识与人品褒奖有加，当晚我发博文简单复述了几句，招致评论区骂声一片。那天在徐叔叔家，聊起我挨骂的起因全是替吴芝圃说句实话，徐叔叔当着吴芝圃最疼爱的女儿吴永杞、女婿李祥义（战争中牺牲的老战友的独子）对我直言：“你挨骂因为他（指吴芝圃）太愚溃（河南方言，傻笨缺心眼）！”二姐夫妇听父亲的老部下这番负面评价，居然一个劲点头认可，我的理解是吴芝圃违背原则对毛言听计从，成为他人生的致命弱点，连家人都无法否认。

我爸爸于明在新四军四师曾兼任师部党支部书记，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是他的直接领导。四师师长彭雪枫在1944年9月牺牲在一次对日作战的战场上，爸爸对我说过当时他就现场，刚刚停火的阵地，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击中彭师长，站在彭师长身边的吴芝圃立即拦腰抱住，两人随即倒地。吴芝圃回忆当时的情景“流弹力量不大，没有穿透身体，却击中要害，倒地后我看到他刚才还明亮的眼睛顿时失去光泽，心想坏了，师长性命难保！”

彭师长的牺牲让四师全体官兵悲痛不已，他是个难得的帅才，人品人缘都好。我曾听我公公王剑青说过一件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彭雪枫的人品。新四军四师成立之初，正面对应侵入中原的日军，战事吃紧，军部急派机要科长王剑青驰援四师，有一次彭师长接连催促破译电报内容，王剑青回怼“人又不是机器，你急我还急呢！”态度同样不冷静。事后，旁边的四师参谋长调王剑青去抗大三个月，嘱咐他“之后直接回军部，四师的任务完成了。”彭雪枫再到军部办事，特意找到王剑青，诚恳地为那次发脾气地接连催促而道歉。

战争期间，彭雪枫与吴芝圃在新四军四师是最受尊重的领导，彭雪枫是能征惯战的指挥员，吴芝圃有学识，以文化相辅。爸爸说抗战初期，部队打了胜仗皆

大欢喜，每次打了败仗总难免有人当逃兵。我问过爸爸“你想过逃跑吗？”爸爸否认并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是游击大队时与日军周旋，撤离村庄前吴芝圃写过一张通告，通篇以四字长诗警告日军，抗击入侵有理，两军作战不得危害平民百姓，日军军官看后赞叹中国军队有高人！此事曾在中原地区传为美谈。另一件事，新四军组建前吴率部有一次打了败仗，伤亡和逃兵很多，余下不多人马跟着吴芝圃撤退，傍晚路过村庄时为了不烦扰乡亲们，故避开村庄绕行，吴芝圃随口吟诵：“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文人、戏剧家的词，吴芝圃脱口而出，竟然与当时战败撤兵情景如出一辙，令读过私塾也喜爱诗词与戏剧的于明佩服，从此坚守在新四军队伍中。

抗战结束后，吴芝圃让我爸爸于明给他当秘书，爸爸不接受，劝了几次，最后那次说“打完仗我带你去鸡公山转转”，爸爸同意了，没想到这一点头竟然当了六年多秘书。从爸爸描述的情况看，他俩的关系与如今首长与秘书的情况大相径庭，竟然有些兄弟般的情谊。比如1950年还是51年，爸爸发现吴有段时间沉迷买书看书，就劝他应该下基层，吴马上安排去了石漫滩、板桥水库现场。1953年春我爸爸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给吴当秘书了，坦言相告，不久有人向他透露省委刚开会决定调他出任省宣传厅厅长，不愿意当官的爸爸啥也没说，马上背个小挎包去了西郊国棉一厂，把自己下放“从头干起”。这件事后，他居然没跟老领导吴芝圃闹翻，两家人继续保持交往。



1948年开封，左二是河南省长吴芝圃，左三是开封市长刘玉柱，左四是我爸爸于明。



1950年在开封的合影，中间坐的是宋传芬、吴芝圃和吴宋长女，站立者左三我妈妈理锐，左七我爸爸于明，右一是吴宋二女吴永杞。

我爸爸参与郑州国棉一厂、国棉三厂建厂后，被派到西安党校学习，大鸣大放时，河南九个学员按主管工作发言表态，管工业、农业、教育等六人均被打成右派。我爸爸从1948年起到1953年下放工厂前，兼管河南省统战工作，属于给党擦粉增光，侥幸全身而退，党校毕业被派回郑州任市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秋，两名北京来的干部找到于明，劝说他“到北京去学英语，然后当新华社驻外记者”。我爸爸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办过《拂晓报》《前进报》，对新闻不外行，只是从未出过国，对驻外感觉陌生，正巧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刚从东欧出访归来，听到我爸爸的顾虑，当即说“我宁愿不当省委书记，更愿意去当驻外记者。”于是爸爸果断离开市委宣传部，决定去做一名驻外记者，1958年12月，我们兄妹随父母来到北京。

七千人大会后，吴芝圃离开河南担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他每次从广州来北京开会，只要我爸妈在京，总会被叫到他住的北京饭店聊天，有一次爸爸刚见面就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大饥荒期间在黄河边景区给政治局常委每人建一栋别墅？吴芝圃委屈地说“不是我的主意，是中南海行政主管专门到郑州找我，见面就责备主席去别的省都有地方住，唯独来河南没个住处。”“那次他拿来图纸，我不得不按着图纸盖了那几座别墅。”爸爸听到这个情况，没法再指责了，“要是我

也顶不住”爸爸说。记得那次聊天我还问爸爸“没个住处？之前毛去郑州住哪里呀？”爸爸说“住省委大院附近的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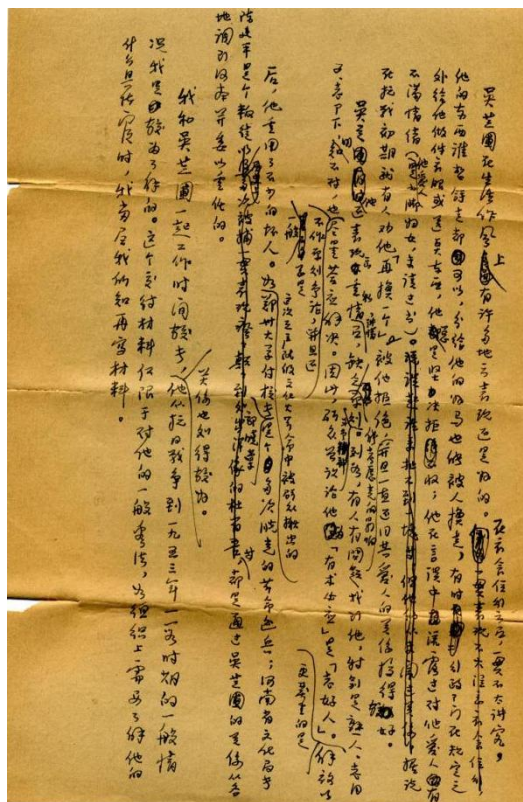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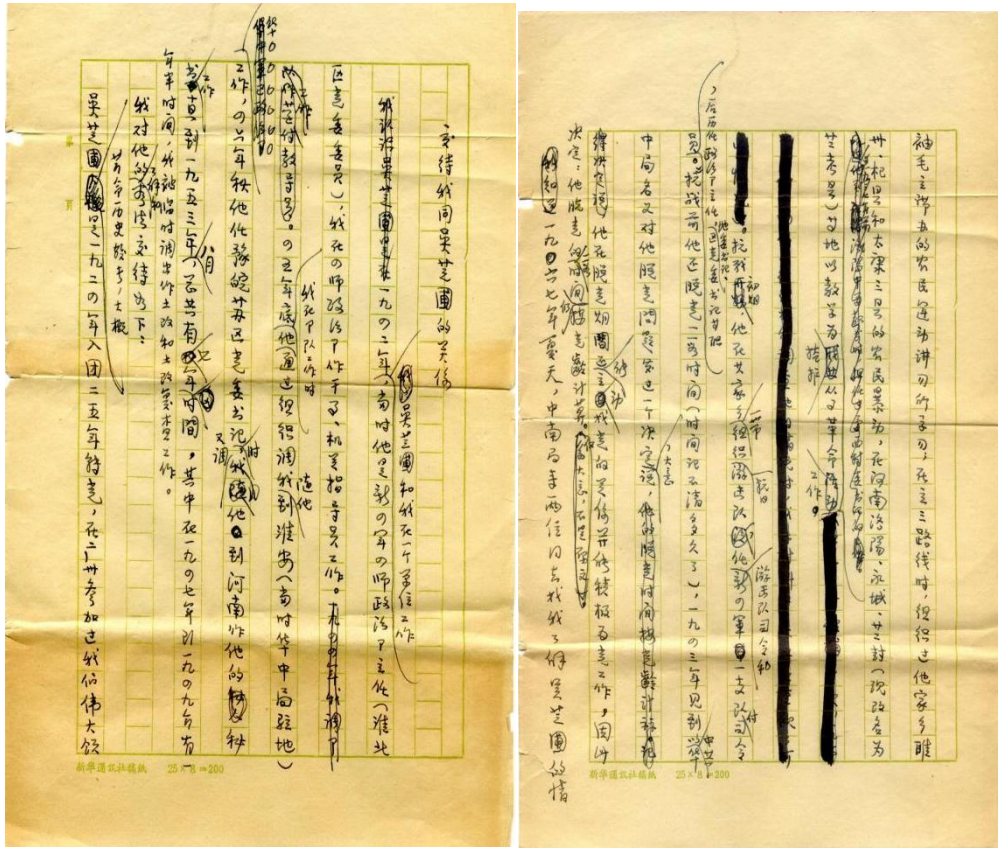
吴芝圃作风正派，家风好，子女都低调朴实。七千人大会后，吴离开河南，全家搬去广州，文革前几年，二姐吴永杞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暑假到我家度过，和我睡一张床，半夜起来我俩曾一起抓蚊子。

于明对吴芝圃的态度

叙述这么多往事，为帮助读者理解吴芝圃为什么把1957年邓小平密诏他进京，当面暗授机宜一事托付给于明。于当过吴六年多秘书，两人彼此信任。吴所托之事，即“潘杨王案”出台内幕，此莫须有冤案的后果有目共睹，潘杨王被驱离中原，吴芝圃主政河南。前因用逻辑推导只有一种可能——彼时国家行政主管邓小平唯毛泽东指令是从，因潘复生没有吴芝圃乖，毛担心钦定的旨意遭抵制。“潘杨王反党集团”未经毛确认，邓岂能自定。想来这一点邓不会泄露给吴，胆小谨慎的吴也不敢追问。

1966年8月下旬，我父母从罗马尼亚回到北京，赶上“破四旧”打砸抢，紧接着揭批揪斗走资派，郑州和广州陆续来人逼我爸爸写“揭发交代吴芝圃的材料”，爸爸保留下一份涂改过许多处的草稿。爸爸去世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之后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征集处的陈宇处长找过我家人，希望提供一些革命文物，妈妈捐出了战争期间我爸爸获得奖品：一台德国蔡斯相机，一支限量版的派克金笔。那两件是张国华（后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在颁奖大会上发给荣立战功的于明的重奖。陈宇得到非常开心，谢了又谢。妈妈还让他从老照片中挑选几张，陈宇拿回去后，很快托人把用老照片放大许多张的一大沓照片送给我妈妈。

2004年我在帮妈妈收拾爸爸遗物时，见到一份钢笔字的揭发材料原稿，妈妈说“那些年每次来人，你爸爸经常抄录这几页。”看到那七页纸片上修修改改的笔迹，文革中爸爸被迫揭发老领导的纠结可想而知，我仔细看了，真的没有落井下石的诋毁之词。



文革期间，我爸爸于明应对接连不断的外调人员，写的交代材料草稿原件的照片，共七页中的前三页。

即便1966年秋冬吴芝圃厄运当头时，爸爸写的“揭发交代”材料中，对吴芝圃“只对你一个人说了”的那件1957年邓小平召吴进京面授机宜，扳倒“潘杨王”一事，也是守口如瓶。

上世纪90年代，我爸妈离休后，赶忙到广州看望吴芝圃的遗孀，他们的宋大姐宋传芬，宋大姐量了身材，给爸爸手织了一件花纹很精致的毛背心。爸爸故去后，妈妈把那件毛背心带到郑州让姥爷穿了好几年，姥爷百岁享年，无疾而终，姥爷的房产存款我妈妈放弃了属于她的那份，只把宋大姐亲手织的毛背心带回北京，又交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

建国之初，姥爷理至善因从事地下工作遭受组织审查，被从开封军区司令员岗位离职，他要求南下渡江参战留在广东，出任过佛山市市长，肇庆市税务局局长、副局长，每次政治运动都在劫难逃，不断降职降薪。抗战时期，姥爷在国民党内卧底，其间跟随魏凤楼冲锋陷阵，中条山战役全团官兵仅余作为军法处长的他在内的四人。长期行军打仗他患上严重的胃病，在广东因消化不了粗糙大米日渐瘦弱。吴芝圃到广州任职后听说这种情况，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给河南省政府写了推荐信，请求旧部把“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解放过17个县的功臣理至善同志调回原籍安排工作”，不久我姥爷回到郑州，被对口安排进郑州税务局二七分局工作。文革初，这位1927年年初入党的老党员差点被打死，却大难不死活到101岁。姥爷的长寿与调回原籍绝对有关，吴芝圃那封写满三页信笺的信，我姥爷一直存留着，也给我看过，我家人对吴芝圃的尽力帮助是心存感念的。

吴芝圃的无奈与于明的选择

我哥哥和我稍微懂事后，爸爸于明陆续给我们讲些事理，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比如1967年春天，“红海洋”兴起之初，妈妈带妹妹出去玩，爸爸关上门说“你俩是中学生，该懂事了”，然后隐晦地指出毛不该迫害老战友们，叮嘱哥哥和我不要跟着做坏事。爸爸说过的人和事，比较多的是吴芝圃，他俩彼此太熟悉太了解了，其中爸爸说过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他曾对吴芝圃说“你不适合当省委书记”，“最适合你的是当河南大学校长。”爸爸还告诉过我，吴芝圃是宋史专家，他每次来北京开会，一有机会就逛旧书店，收集各种版本的宋代著作。吴病故改开后，吴芝圃的家人把吴的藏书悉数捐给广州图书馆，从此那座图书馆成为集宋

代古籍最全之处。

1963到1966年爸妈在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那些年吴芝圃到北京开会时，总会抽空到家里来看望我兄妹，每次来不空手，有一次提了一大袋红元帅苹果，我第一次见到那么红艳硕大的苹果，好奇地问是什么？吴说“红元帅苹果”，我忙说“苹果也有元帅？没见过这么大个的”，吴告知“特供商店买的”。我早听说吴伯伯和家人生活极其简朴，省吃俭用的钱都被他拿去买书，他家人八成吃不到红元帅苹果了，此事至今记忆犹新。他是爸爸的老首长，这么照顾老部下的孩子，现在的首长与秘书还有这种关系吗？所以1967年听到吴芝圃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很难过，也替二姐感到伤心，又不敢表现出来。吴伯伯与我爸爸虽然是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因为是新四军老战友，加上二人都是爱读书的文化人，尽管吴芝圃身背骂名，尽管我爸爸死活不做官，不服从老领导的安排，二人却难得地彼此信任与关照。



1967年7月，吴芝圃被狠批猛斗后身亡，只有家人为他送行。

吴芝圃及家人与于明的关系，加上从小到老，我听到过太多有关吴芝圃的事，也听闻到社会上对他太多的负面评价。从2006年我开始在网上发博客，数次因为对吴说过几句公道话，被不少人诅咒谩骂，也被朋友们不理解，其实大家不清楚吴对毛既有顾念老师的顺从，又有毛特派谭震林坐镇郑州，不得不强推人民公

社的隐情。吴芝圃身为河南省早期中共党员，省委主要领导，为毛冲锋替毛顶罪，长期以来欲罢不能，骑虎难下。1967年被恶批狠斗，60出头就悲惨离世，饱读诗书为人厚道的他，那份无奈与悲凉几人知晓？

行笔到此，突然醒悟到我爸爸于明从1953年到1980年起码有三次辞官不做的经历，本文前面说过1953年和1958年的事，到了1980年底，于明因在司法部党组会讨论时，打破冷场率先反对邓小平对魏京生、傅月华案“避开司法程序，继续关押”的内部批示，发言说“文革已经结束了，不能再做回避司法的事”，会后被魏文伯部长警告“下不为例”，他很快离开部机关，与老战友庄重一起创办了《法制日报》。我以前没想过，爸爸为什么会有此反常之举？走笔至此，才一下子明白过来，吴芝圃的际遇分明是他创办《法制日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我家老相册里有三张并排贴着的120老照片，两张吴芝圃在石漫滩和板桥水库视察的工作照，一张蹲着看图纸，一张站着听汇报，还有一张吴省长与当地干部农民二十多人的合影。我翻看老相册时询问，爸爸妈妈讲了一些陈年往事，爸爸说：1950年，有段时间吴芝圃情绪低落，托病不上班在家看书，爸爸跟他急了，“这么多事你不处理，也不下基层，像什么话？”吴问“下基层？去哪里？”爸爸说“中原兴修水库任务急迫，你不去督促一下说得过去吗？”于是，吴很快去了水库工地。建国初吴芝圃为什么闹情绪？我已经无处询问，爸爸也没说过，不难想象官场中的难言之隐犹如刺伤人性的利剑，爸爸在吴芝圃身边很早就深刻领悟了，他一辈子避之不及，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辞官不做。

还有件事，以前我只对好友李振盛老师提起过。那次在方庄李老师家里欣赏他的文革照片，见到一张他拍的1967年批斗潘复生的现场照片，我想起爸爸说过“潘杨王”被定性反革命集团离开河南后，“吴芝圃出差时，曾到潘复生住处看望过他，二人达成了谅解，不久后潘复生复出担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爸爸透露给我这件秘密时，以及那天我对李振盛说起吴潘私下和解这件事时，我还不知道1957年初春，邓小平密诏吴芝圃密谈之事，对潘吴两位官场敌手居然能和解，一直感觉不可思议。

当事人陈健阿姨与我

接下来说当事人陈健阿姨，陈阿姨和她丈夫周原都是新华社的老记者，上世

纪60年代，周原在河南分社当记者时去兰考采写焦裕禄事迹，写的长篇通讯发表前经新华社总社两位领导冯牧和穆青审阅，穆青连夜润色批改迅速见报，那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时，虽然原作者周原被名列末席，但那篇文章颇具影响力。周原、陈健1948年在开封时就是我父母的朋友，他俩结婚时送给我父母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因周原1957年被屈打右派，文革初又被整得掉层皮，陈健趁夜逃离新华社郑州分社，到北京见到当时总社一把手王唯真，王唯真派人搭救出绝境中的周原，随后王唯真也靠边站了。

改开后，周原和陈健从河南分社调到总社，我爸妈和他俩晚年都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两家离的很近，陈健和我妈妈离休后经常一起晨练，一起聊天。有次陈健说起1966年到67年被一次次抄家，好多东西都没了，连那张俊男靓女结婚照（两人年轻时都相貌出众）也没留下，最为遗憾。我妈妈回到家翻找出保存半个世纪的那张照片还赠回去，陈健阿姨高兴得像捡到宝贝！记得我发现爸妈最珍爱的两大本老相册中又少了一张，追问才知道这件事，因同情陈阿姨，就没好意思责怪妈妈完全可以到照相馆再洗一张新片送人，老相册又缺一张真可惜。2019年3月，我去看望陈健阿姨的路上还想起此事。

直到2003年，我爸爸于明感觉自己病势沉重，挺不了多久后，才让妈妈把陈健叫到家里，希望陈健阿姨能把吴芝圃所托之事“写出来留给后人”。这种事太棘手，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啊，估计陈健阿姨也同样为难，年过90岁后，让儿子乔海燕唤我过去，把这个历史小包传到我手里。

几句话的包很小却很重，一件60多年前的政坛秘闻，事关反右前夜“潘杨王反党集团”案的起源内幕，我不知该如何继续传递，搁在心中拿得起又放不下。2019年4月初，去陈阿姨家之后，我和老伴儿离京去新加坡住了近两年，其间分别与在上海的文革史专家李逊、在北京的新闻教育专家李大同通电话时说过此事，他俩都认为既然是我父亲听到的内幕，作为家人我避嫌为好。李大同说“你再回北京，可以请陈健阿姨录音保存”，这个主意可行。

2021年2月，疫情中回国两次被异地隔离，4月中旬回到北京，我两次穿城而过，竟然没能找到陈健阿姨，给陈健阿姨的儿子乔海燕打电话总没人接听，提着礼物在楼下问来问去，上楼东找西找都没能见到陈健阿姨。眼看三年又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没有着落。考虑到陈健阿姨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人知道当年邓小平

与吴芝圃两人密谈的事，邓吴于三人早已作古，找陈健阿姨录音证实未能如愿，我只能如实写出来，了却爸爸的遗愿，但愿给历史学家、党史研究学者在厘清反右内斗起源，以及正确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功过是非时，留下一份可资参考的史实。

上网百度“潘杨王案件”，意外地看到杨继绳先生在他的长篇巨著《墓碑》中写过此事，杨先生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多角度严谨地展示出这段时期的史料。《墓碑》书中没有我说的邓吴密谈一事，因为知道的人太少。昨晚与上海学者朱学勤老师电话聊天，我说因疑虑杨继绳先生只记录了吴芝圃负面言行，永远替毛背锅，曾跟杨先生发过一次无名火。朱学勤老师宽慰说“老杨不会计较你的”，于是我打算找机会向杨先生道个歉。2023年7月下旬，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发给杨继绳先生过目，杨先生立即把《墓碑》电子版第一章全文发给我。再次细读此章节，确认其极为客观公允，并无瑕疵，多处情节与我以前听到的恰好吻合。为帮助读者了解潘杨王事件，下面我引用几个《墓碑》中的史料，确切简介相关背景。

“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

“潘杨王”曾是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潘复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潘杨王在推行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主张稳妥慢进，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遵照毛泽东旨意主张冒险激进，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批评主张慢进的人是“小脚女人”。

吴芝圃按照中央的部署，1957年8月召开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潘复生“右倾错误”，这一年河南省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省干部总数的12.7%，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1958年5月中央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由吴芝圃接替，同时撤销了杨珏和王庭栋的职务，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批斗后押送到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当社员。1962年，他们三人被低调平反，并相继安排复出。

1958年，河南省在北京来的谭震林副总理坐镇、吴芝圃指挥下，列出八条

罪状猛批“潘杨王”，揭批运动中大字报铺天盖地，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很多农民误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干部群众为自保参与残酷迫害，直接摧残致死就高达百多人，引发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

大跃进期间，河南不断推出经验，《人民日报》一次次介绍并推广，使河南省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共产风”中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都出自河南，均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随后的大饥荒，河南在重灾区中排名靠前，饿死了数百万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1962年4月，吴芝圃仅被免去河南省的职务，调广州出任中南局书记处分管文教的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后来又数次痛心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到广州后，有一次中南局召集所属几省干部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注：以上五个自然段的文字，均摘录自杨继绳先生巨著《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感谢并致敬杨继绳先生！）

无论如何，吴当年亦步亦趋，甚至忍辱负重执行错误命令，在党性上能说得通，若以公正道义来评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事件彻头彻尾是莫须有的罪名，吴芝圃心知肚明。因此无论在执行经邓小平授意后施以政治迫害，还是协助毛泽东率先在河南推行人民公社，协助推动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制造出饿毙数百万河南民众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吴芝圃犯过大罪，罪无可赦。他的悲惨结局与违背良知助纣为虐有直接关联，在延绵不绝极端残酷的内斗中，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都不是孤例。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像吴芝圃这样一个酷爱读书、不擅长阴谋诡计的人，因依附独裁者竟然充当黑暗急先锋，虽风光一时却迅速坠落。

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小情累积构成的，内幕与细节往往最有说服力。人性复杂多面，趋利避害是大概率，与其改造人，不如促进制度进步。■

2022年1月16日初稿，于北京

2023年7月28日，马来西亚森林城市修订

附录：

1957年河南省“潘、杨、王”事件³⁴

杨继绳《墓碑》摘选

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委员，第二年就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90年代当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销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

³⁴ 这一节内容除了另有注明外，均出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三次谈话和王庭栋从山西寄给本书作者的文字材料。此节成稿后又经杨珏、冀雨、王庭栋审定。

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被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 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

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 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上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 “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 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 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 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 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 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

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4.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账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

（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销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

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³⁵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年河南揪出7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

³⁵ 谭震林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7月15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58，期限：永久，卷号：1414。

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见本书“粮食问题”一章。]，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³⁶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

³⁶ 关于河南水利建设这一节资料除了另有注明外取自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编《大跃进中的河南水利》，1998年。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水利40年掠影》，《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立方，蓄水能力262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亿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至于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一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

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年10月以后，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³⁷

2.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³⁸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³⁷ 王从吾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188。

³⁸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35页。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嵒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³⁹。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略）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³⁹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0—117页。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 / 去年卖粮用船摇 / 今年汽车装不了 / 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⁴⁰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⁴¹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实的。1999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⁴²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⁴⁰ 人民日报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

⁴¹ 乔培华：《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2000年7月19日，第24—25页。

⁴² 《河南日报》7月11日一版头条：《西平和平农业社发出丰产大卫星 二亩小麦亩产7320斤》。

嵯峨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⁴³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嵯峨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3. “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

⁴³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0页。

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嵯峨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日《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

⁴⁴ 中共长葛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对坡胡公社第一管理区赏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情况的检查报告》，载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66—67页。

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⁴⁵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⁴⁶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

⁴⁵ 杨珏、冀雨 2001年3月19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⁴⁶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 32 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 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 7 月 23 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⁴⁷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 1959 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⁴⁸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 年农业产值 35.55 亿元，比 1958 年下降 8.9%，粮食总产量 97.45 亿公斤，下降 22.9%；1960 年农业产值再下降 11%，粮食产量仅有 88.69 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 74 万头）[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载《二十一世纪》1998 年 8 月号第 48 期]。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 5% 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 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 1962 年 1 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 58 年、59 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 5% 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⁴⁷ 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⁴⁸ 同上。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⁴⁹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⁵⁰

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

⁴⁹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国际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85页、91页。

⁵⁰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2006年第2期。

“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⁵¹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⁵¹ 中央工作队魏震1960年12月21日报告：《关于唐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 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 当年平均人口 × (当年死亡率 - 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 = 当年平均人口 × (正常出生率 - 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 = [(1955, 1956, 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 / 3 + (1964, 1965, 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 / 3] / 2

正常死亡率 = [(1955, 1956, 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 / 3 + (1963, 1965, 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 / 3] / 2

当年平均人口 = (上年年底人口 + 当年年底人口) / 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

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

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他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年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河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⁵²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他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

⁵²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63页。

错误”。⁵³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⁵⁴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

⁵³ 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⁵⁴ 王任重同志在河南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2月10日。见乔培华《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第130—132页。

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做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⁵⁵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⁵⁵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 2006年第2期。

【百年国史】

绘本特殊年代

——漫笔童年饥饿（1959--1966）（十一）

墨娃

特殊年代

墨娃绘本

上册



挖野菜。

文革前，真武庙路西边有一条铁路是从大同方向开往北京广安门火车站的。再往西，铁路坡下有一片茂密的草地。春天来了，那里总有一群群的人采摘野菜。饥饿让很多北京人学会了识别野菜的本事……

文革前，真武庙路两边有一条铁路，是从大同方向 开往北京广安门火车站的。再往西，铁路坡下有一片茂密的草地。春天来了，那里总有一群群的人采摘野菜。饥饿让很多北京人学会了识别野菜的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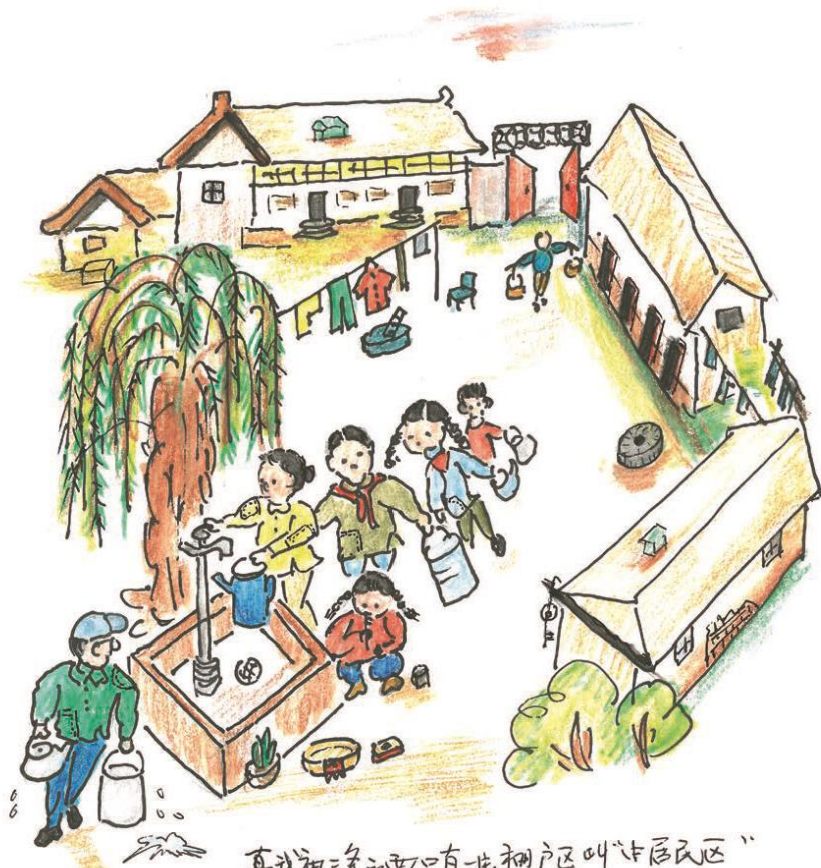
偷吃芝麻酱。

从1959年到1962年，全国人民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除了高级干部有些特供，老百姓没有一人不挨饿。到了1963年才慢慢有点好转。过节的时候，每家分一两芝麻酱。我家芝麻酱总被妈妈藏起来，想是有人改善一下伙食。可是无论我妈把芝麻酱藏到哪里，我和二哥都能找到。有一次，我和我二哥一下子把刚刚买回来的一瓶子芝麻酱全吃光了，害得打了一晚上的嗝……



偷吃芝麻酱

从1959年到1962年，全国人民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除了高级干部有些特供商品，老百姓没有一人不挨饿。到了1963年才慢慢有点好转。那时候过节，每户每人一两芝麻酱。我家芝麻酱总被妈妈藏起来，为的是招待客人。可是无论我妈把芝麻酱藏到哪里，我和二哥都能找到。有一次，我和我二哥一下子把刚刚买回来的一瓶子芝麻酱全吃光了，害得打了一晚上的嗝……



真武庙二条的西口有一片棚户区叫“中居民区”
居民的新地基是四、五十年代从北京周边或河北省来京的流
民，我记事后，看见他们衣衫褴褛，一脸菜色，住在大杂院里，
以打零工为营生，一条小街只有一个水管子，每天早晨这里
好一个热闹，三年饥饿的时候，那里的日子过得特别惨……

真武庙二条的西口有一片棚户区，叫“中居民区”，居民的来历基本是四五十年代从北京周边或河北省来京的流民，我记事后，看见他们衣衫褴褛，一脸菜色，住在大杂院里，以打零工为营生，一条小街只有一个水管子。每天早晨这里人声鼎沸，好一个热闹，三年饥饿的时候，那里的日子过得特别惨……



真武庙二条老 302 大院后门外, 有个垃圾站, 院子里的生活垃圾和锅炉房的煤渣, 每天都要倒在那里。周边居民区的住户常常是一群群地在垃圾里捡拾破料。煤核儿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那些冒着烟的煤核儿, 一会就成了他们桶中的战利品。我想, 穷人怎么这么多?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饥饿的时代的年代，市场上无食品，人们肚子里无油水，政府还不让老百姓自由买卖，若有违者就会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日子过得太难啦！

但是依然有胆大的京郊农民，他们会在天色渐黑的时候进城，卖一些自家的鸡蛋、小鲁、农家菜什么的，那时候，老302，新302宿舍以及周边大院的门口，经常会看见这样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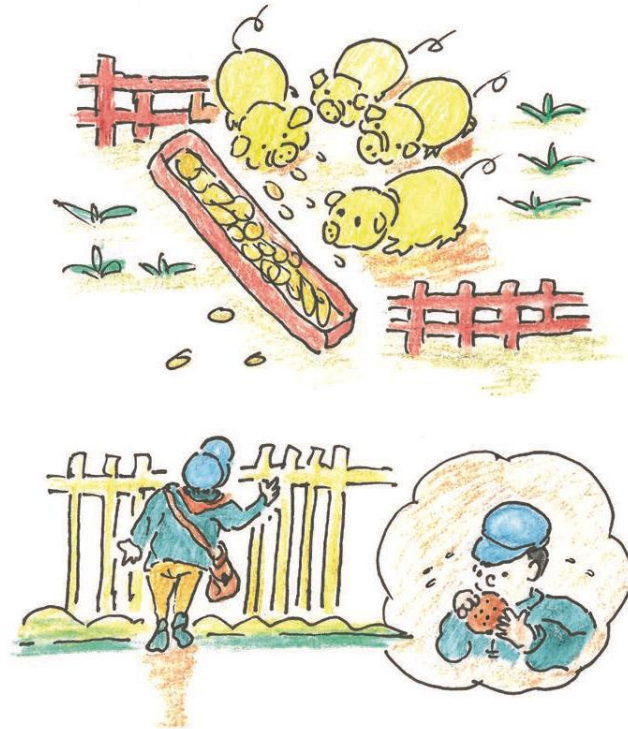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饥饿的年代市场上无食品，人们肚子里无油水，政府还不让老百姓自由买卖。若有违者就会戴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日子过得太难啦！

但是依然有胆大的京郊农民，他们会在天色渐黑的时候进城，卖一些自家的鸡蛋、小鲁、农家菜什么的，那时候，老302，新302宿舍以及周边大院的门口，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豆腐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常菜。可是在
 饥荒的年代吃一块可不容易。副食店来了豆腐。排队
 的人一圈又一圈。还不能保证买到。凭证每人一块。
 买到家切点白菜炖一锅。一下子就吃没了……

豆腐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常菜，可是在饥饿的年代吃一块可不容易。每当副食店来了豆腐，排队的人一圈又一圈，凭证每人一块，还不能保证买到。买到家，加白菜炖一锅，下子就吃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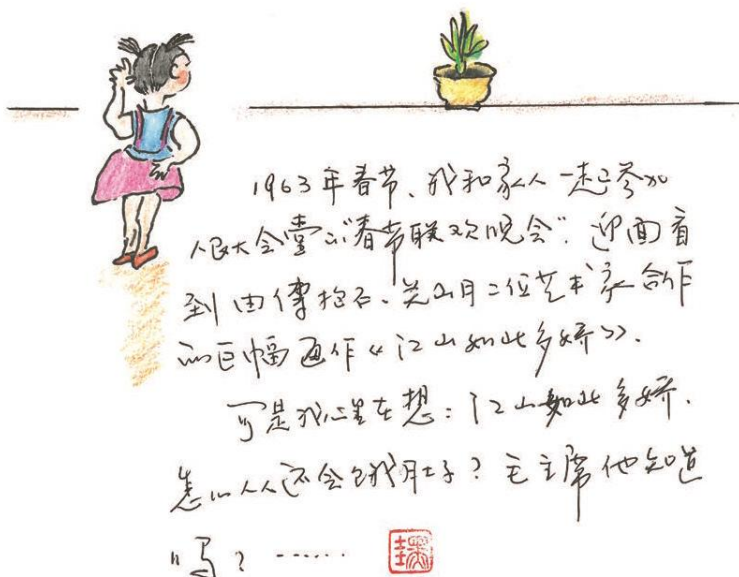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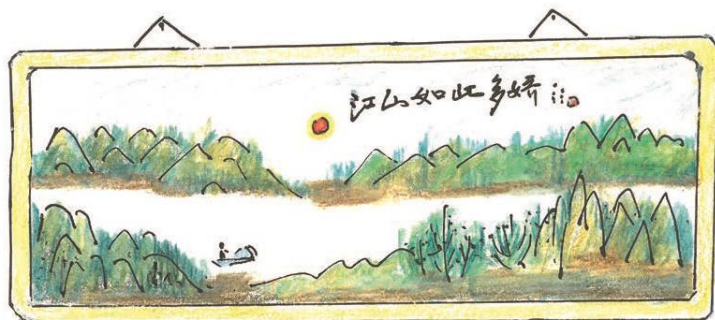


豆饼是一种猪饲料。它是把榨油后的黄豆压成饼子，很硬，养猪户离不了这种饲料。时逢饥饿的年代，不少人被饿得吃过豆饼。我有个表哥就多次悄悄跑到北京的郊区偷吃老乡的豆饼。长大后，他对我说，豆饼特牙碜，里面还有头发……

豆饼是一种猪饲料，它是把榨油后的黄豆压成饼子，很硬，养猪户离不了这种饲料。时逢饥饿的年代，不少人被饿得吃过豆饼。我有个表哥就多次悄悄地跑到北京的郊区偷吃老乡的豆饼。长大后，他对我说，豆饼特牙碜，里面还有头发……



那年月，看见我爸每天骑车忙忙碌碌，心里总是想，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我爸买头驴，省事不累，一拍屁股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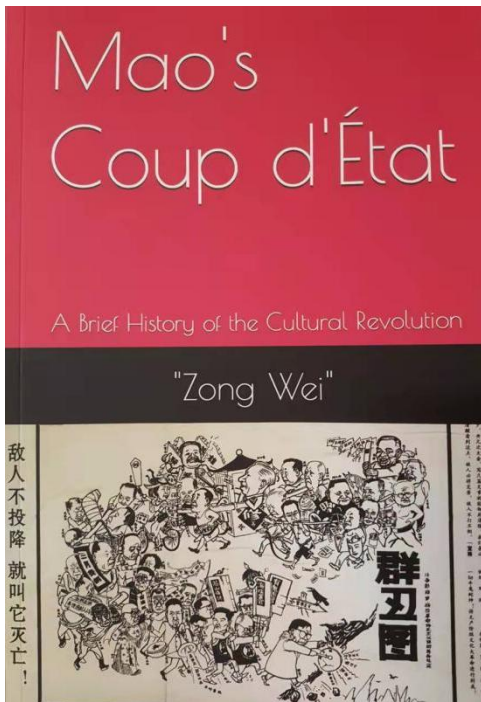
1963年春节，我和家人一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晚会”。迎面看到了由傅抱石、关山月二位艺术家合作的巨幅画作《江山如此多娇》。

可是我心里在想：江山如此多娇，怎么人人还会饿肚子？毛主席他知道吗？……

【书讯】

纵纬著《毛泽东的政变：文革简史》英译本在美出版

作者小传 本书目录



纵纬著《文革简史》，英译本书名《毛泽东的政变——文革简史》一书，2023年5月19日在美国出版。

ISBN : 9798367606669

亚马逊购书网上有售

https://www.amazon.com/dp/B0C5PJRHLS?ref_=pe_3052080_397514860

美元：18.99 (USD)

https://www.amazon.com.au/Maos-Coup-d%C3%89tat-Cultural-Revolution/dp/B0C5PJRHLS/ref=sr_1_1?keywords=mao%27s+coup+d%27etat&rnid=5367991051&s=books&sr=1-1

澳元：31.4 (AUD)

作者小传

我1950年代出生在一个共产党的小官僚家庭。父亲1930年加入中共，母亲1933年、1938年先后两次加入中共。文革前，父母均为某省干部。

这样的家庭给了我两个重要的“礼物”：一是自信，一生中不管处于何种环境，挫折也好、低潮也罢，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另一个就是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相对优裕的环境，使我能有大量时间读书。

我从小就是个“书迷”。小学2年级开始读中国的长篇小说，3—4年级基本读完了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同时也开始对自然科学的科普文章感兴趣。小学5—6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还有苏联的反间谍小说，并开始接触国外的一些科幻小说，如《大战火星人》、《隐身人》等。好

在父母所在的单位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是我取之不尽的书籍来源。中学是一家全省重点中学，藏书甚多。课余时间，我的阅读兴趣转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情节小说及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1966年——我的“16岁花季”，文革突然降临。最初说停课两周，后来说三个月，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文革之初，我是那么的虔诚，相信这是一场净化社会和人的灵魂的大革命，甚至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但，渐渐地感觉革命变味了。为什么要烧书，把人类文明的结晶说成“毒草”？为什么“武斗”屡禁不止，还有人以折磨别人为乐？信誓旦旦的“一小撮”为何成为1949年以后，从来未有的“一大片”？

半年后，父亲也沦为“走资派”，开始遭到数不尽的白眼与歧视。想想自己也曾拿“出身”歧视过别人，有了一种痛彻心扉地醒悟。鲁迅先生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文革前，我的世界充满了鲜花——祖国是那么美好，人民是那么幸福，叔叔阿姨都那么和蔼可亲——但父亲被打倒后，立刻感到世界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变得完全不认识了

为了躲避武斗，为了不给处境困难的父母惹麻烦，我很不情愿地留在家读书：开始硬啃马列大部头经典著作，也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文革前父母不允许我读的“灰皮书”——大大开拓了眼界。偶然间读到了一本《鲁迅全集》，更是令我着迷。鲁迅先生对中国的解剖入木三分，也使我从自己个人的不幸，家庭的不幸，转而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苦难。

1968年，毛泽东把我们这些既没有学可上（大学停办）、也没有岗位就业（2年多的时间里只顾“革命”了），从初一到高三总共6届学生统统扫地出门，赶到农村这个据说是“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初来乍到，农村的贫困还是让我吃惊不小，“解放”20年了，广大种地的农民连肚子都填不饱。我看到了农民拥护的，批为“资本主义”；反对的却大行其道——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为什么丝毫不考虑百姓的愿望？

在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在肚子都填不饱情况下，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读书。没有电，就用自制的煤油灯。冬闲时间，常常会读到

凌晨一两点。好在农民并不关心我们读什么书，更不了解哪些书是被禁止的“毒草”。

1971年至1975年，我去了北京某部当兵。期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9.13事件”。此后，严酷的政治环境有所松动。借助北京亲戚，我又从几所高校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文史著作，这个时期，我读完了《鲁迅全集》的全部杂文我部分。

1975年，我从部队退伍。分配到某省会城市公安局派出所，成为一名警察。凭借细密的分析而不是刑讯逼供，我破获了大量的刑事案件，曾被授予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称号。破案养成的思维方式，对我今后解析文革中的谜案，透过表象挖掘被掩盖的实质很有帮助。

1985年，意识到改革大潮将起，我毅然告别“铁饭碗”，“下海”经商。两年多的摸爬滚打，既让我发了一笔小财，也使我对改革的理想化破灭。我朦胧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将会被扭曲。没有民主、宪政，文革浩劫仍可能卷土重来。此时，也正是此时，我萌发了探索文革真相，并写一部“文革史”的念头。并开始了文革资料的收集工作。

1987年，我考取了某报记者。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我只好到处借书，恶补新闻理论以及西方记者的采访经验。我所撰写的论文曾获得1991年该领域的全国学术二等奖。在这一时期，我对文革研究的关注度有所降低。

2000年，种种原因我从该报社辞职。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办起了一家网吧，学会了上网。读书和收集文革资料，交流对文革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比较积极的阶段。

2007年，我获得澳大利亚2年的临时居住签证；2009年获绿卡，移居澳洲。

从我动写文革史的念头起，已经过去了30多年。不管是做记者的十多年时间里，还是在辞去记者后的日子，我都没有忘掉收集文革资料，阅读文革书籍、文章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力图摸清文革的脉络。余生一定要写一部《文革史》，已成为我的“汉尼拔誓言”——不写出此书，死不瞑目。

2017年，这部历经了30年的资料准备，数十次修改、补充的《文革简史》，终于落笔了。所幸有武汉大学朱宾忠教授和美国朋友保罗合作，翻译成英文。他们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付出的心血和精力难以言说。如果没有一个让世界知道文革浩劫崇高的使命感，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目录:

前言

第一部：文革的前奏

第一章：文革的源头

1. “大跃进”的发动
2. “大跃进”的恶果
3. “大饥荒”成了毛的心病
4. “七千人大会”，分裂已见端倪

第二章：矛盾的堆积与扩大

1. “游泳池”之争
2. 毛对“交权”懊悔不已
3. 毛不甘当“名誉主席”
4. 毛泽东绑架中共
5. 反过来了：毛向刘索权
6. 从犹豫、徘徊到铁下心“倒刘”

第二部：群众运动掩盖下的政变

第一章：发动与推进

1. 发动文革的两条线
2. “扣动扳机”前后
3. 毛号召向中央进攻
4. 震动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 迷雾重重的“二月兵变”
6. 毛主席“炮打”刘主席的“司令部”
7. “红卫兵运动”的今世前生
8. “大串联”与个人崇拜的升温
9. 从“对联”到“谭力夫讲话”
10. 保护“民主人士”
11. 地院校园里的神秘人物

12. 阴暗角落里的龌龊交易

第二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 林彪的国庆讲话
2. “紧急指示”，军队也拖进去了
3. 中央工作会议
4. 纪念鲁迅，意在“痛打落水狗”
5. 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
6. 工交座谈会——关注国计民生遭打压
7. “安亭事件”，靠工人造反打破党内阻力
8. 四位元帅给军队运动降温
9. “联动”挑战中央文革
10. 张春桥召见蒯大富密授机宜
11. 揪回彭德怀
12. “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陶铸垮台
13. “倒贺”——林彪要清除接班路上最大的威胁

第三章：“把文革进行到底！”

1. 上海“一月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2. 召见刘少奇
3. 大闹京西宾馆，军委“8条命令”出台
4. 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
5.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对刘批判升级
6. 神奇的“老三军”与“五一三演出”
7. “伍豪启事”与“5.16倒周狂潮”
8. “大抓‘516’”的来龙去脉
9. 武汉“720事件”
10. 周恩来果断出手，王关（戚）被抓
11.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12. 外交部91人大字报
13. “杨余傅事件”的来龙去脉

14. “炮打张春桥”
15. 毛记“工作组”——派工宣队，召见“五大领袖”
16. 广西大屠杀，“全国山河一片红”
17. 骇人听闻的伪证制造
18. 非法“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19. “九大”——庆祝文革“胜利”的大会

第三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

第一章：文革阵营的勾心斗角

1. 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之间的齟齬
2. “李必达事件”
3. 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4.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5. 纷争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章：矛盾激化

1. 庐山较劲
2. 毛出手干预，形势逆转

第三章：“913事件”

1. 林彪的对策
2. “912之变”

第四部：毛竭力保卫“文革成果”

第一章：毛周缠斗“身后事”

1. 周恩来的选择
2. 毛泽东竭力自圆其说
3. 毛欲选江青“接班”，周守住了底线
4. 被借题发挥的陈毅追悼会
5. 离奇的公安部长之死
6. 邓小平复出

7. 政治局批周，一出首尾大相径庭的闹剧
8. 批林批孔——中途夭折的“倒周”之举
9. 张志新批毛遇难
10. 毛泽东左支右绌，力难从心
11. 灯油将尽，最后的挣扎
12. 人民的呐喊
13. 密云不雨，爆发前的沉闷

第二章：尾声

1. 抓捕“四人帮”，颠覆文革体制
2. 再探毛发动文革的动机：
 - (1) 理想主义说：
 - (2) 反官僚、反特权说
 - (3) “权力斗争”与“改朝换代”说
 - (4) “权力斗争”加“掩盖罪恶”说

【书讯】

丁东、邢小群著《士林剪影》在博登书屋出版



【当代华语世界口述历史丛书】

学术顾问：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主 编：荣 伟

副 主 编：罗慰年

出 版：博登书屋·纽约(Bouden House·New York)

版 次：202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 数：163千字

定 价：\$30.00 美元

目录：

周有光 1/于光远 6/ 李普 12/ 何兆武 17/ 杜导正 23/ 戴煌 26/郭道晖 32/
茅于軾 38/ 资中筠 41/ 江 平 45/ 朱厚泽 51/ 蒋彦永 56/ 宋以敏 60/
朱 正 64/梁从诫 70/ 鲍 彤 75/阎 纲 79/ 邵燕祥 83/董健 88/张森根 92/
钱理群 97/沙叶新 103/ 杨继绳 109/章诒和 115/周宗奇 122/ 卢晓蓉 127/
智效民 131/ 陈小鲁 135/ 马立诚 139/马 波 143/王端阳 150/ 张石山 154/
沈嘉蔚 159/ 张立华 164 / 胡发云 169/ 王东成和林淑芳 174/ 毕星星 178/
王康 183 / 李南央 188/ 郑也夫 192/ 贺阳 196/ 陈为人 201/ 钱 茸 207/
王家鹏 211/ 贺延光 215/ 吴 迪 219/ 李大同 223/ 赵 诚 227/ 李 昕 232/
鄢烈山 236 / 程嘉树 240/艾晓明 244/ 金雁 248/ 盛洪 252/ 冯克力 256/
李新宇 261 /丁 宁 264/ 方 方 268/牟广丰 272/ 赵 瑜 276/ 雷 颐 280/
崔卫平 284/老 村 292/邵 建 295/李洁 299/荣 剑 302/吴 思 306/胡杰 309/
李庆明 313/ 赵虹 317/陈徒手 323/谢泳 327/慎志浩 332/傅国涌 335 艾芬 340

《士林剪影》选摘：



何兆武先生，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他以治中国思想史闻名于学界。是他引进了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苇草。思想形成了人的伟大。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也是他的自况。

我们与何兆武先生的交往始于1990年代。最初是他的读者，后来在公共场合相识，感到他学识渊博，待人谦

和。我应青岛出版社之邀主编《野菊文丛》第二辑，何先生向我推荐了他的学生程映虹的一部书稿。书出版后，我和小群一起到清华大学何先生寓所拜访。同一文丛中有小群的《凝望夕阳》一书，一并呈上请何先生指正。何先生认真看了小群的书，给予好评。他还谈到书中叙述的担任过章乃器秘书的许汉三是他旧识，1950年曾在华北联大同学。他让我们代致问候。我们将此意转告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

不久，何先生专程到航空胡同看望分别几十年的许先生，邀我们作陪。当时，我和高增德先生共同主编《世纪学人自述》，拟收200位学者的自述，编成六卷，用在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也请何先生提供一篇自述，置于第六卷卷首。

他的自述结尾一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种动物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如历史、文学、哲学）来说，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何先生这段话至今令人深思。然而我们后来看到的事实是，经历了“文革”的几代中国学者作家，实际上拿出的有份量的成果屈指可数。现在，“文革”时的青少年也步入老年，中华民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化收获。这不能不让人慨叹。

不久《社会科学论坛》创刊，赵虹、张平来北京邀我参与。他们尊敬何先生，让我再次到何先生寓所登门专访，请他评说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走势。何先生认为中国处在晚清、五四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觉醒。怎样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恐怕还得一个时期才能摸索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入正轨，总还得经过一段时期。

他还谈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比如：“重要的人物应当写回忆录，非常值得写。但在我们国家，越是重要的人物，越不大好写。比如，江青没有留下回忆录，好像也没有找人让她口述整理，太可惜了。一部‘文革’史，她是最重要的人物了。“一些重要的人死了，悼念时都有一句：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有的其实不符合事实。如果那么多都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怎么会长时间被‘四人帮’专了政？”

当时是有很多人挨整，也有很多人整人。有的人挨过整，也整过人。时至今日，挨整的人都诉苦，整人的都不说整人。“我在国外访问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唐君毅接受访问，记者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大陆的知识分子挨整？他说知道，不过他们应该挨整。因为大陆知识分子太没有骨气了，所以应该挨整，大意是这样。有一次我和李泽厚提这件事，他笑了，说，让他在这里试试。

“学术思想与政治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只看到它有关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不同的一面，是不行的。纯属于科学问题由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假如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有价值的话，可以资助一点，但不要用行政命令来出面。我刚刚到清华来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让我出题目，我出了题目，后来教务处跟我要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至少我们文科的，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你说老子是唯物论，我说老子是唯心论，这没有标准答案。

过去旧北大自由度大一点，旧清华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当然各有各的好处。要求严格一点可以使学生基础比较全面、比较扎实，自由度大一些就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时候，什么样的教授都有，有保皇党，有自由主义，有激进的民主派，有布尔什维克。蔡元培有这种气魄，当年的北大也有这种气魄。今天要调一个人进来，人事部门看档案，这人是保皇党，能要吗？不能要。这人是造反派，也不能要。蔡元培什么人都要，辜鸿铭、刘师培要，胡适要，李大钊、陈独秀也要。这种传统现在看不到了。”

何先生翻译过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论历史》、费米夫人的《原子在我家中》、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等书，在学界影响很大。……

【序跋】

《士林剪影》自序

丁东 邢小群

我们夫妻的图文配。图为邢小群的素描人像。文除了少数几篇出自邢小群之手，多为丁东执笔。

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之说，“士”大略相当于今天的知识阶层。士林即复数的知识分子。本书包括70多人的画像和小传。他们共同的身份，都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最年长者为周有光，最年轻者为艾芬。其中以1950年代出生者最多，1940年代出生者其次，1930年代出生者再次。我们是50后，熟人朋友也以40、50后居多。现在，1950年代出生者已经超过60岁，达到退休年龄，即将淡出历史舞台，到了回首生平的时候。40、30、20后更是如此。其中一些已经远行到另一个世界，成了我们追怀的故人。

这70多篇图文配，是70篇人物小传，传主的社会角色，有学者、作家、诗人、画家、导演、编辑，记者、医生、校长、图书馆长，其中最多的是学者，他们的专业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语言、国际问题等等。之所以画他们，除了与他们相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他们都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育，做过或多或少的贡献。

文章以介绍他们的人生亮点为主，兼顾和他们的交往。因为是在公众号发表，所以篇幅都不长，一般在两千字左右。微信多用手机阅读，这是一种快餐式阅读，文章长了，注意力难以集中。讲人生故事，只讲二三细节，不是对传主的全面评价。有的传主或许存在争议。我们主张看人看长处，看他有哪些优点值得发扬，哪些地方做出了贡献，哪些事曾经开风气之先。其实，人活一辈子，能在一两件事上推动社会进步，就很不容易了，中国是官本位，知识分子处在边缘地位，发挥作用受到很多限制。不时看到对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失望的议论。我们也认为，当今中国知识界，总体上不值得打高分。对知识界的犬儒病、软骨病，卖身投靠权力和资本，为虎作伥的批判、揭露，都有必要。但是在表达的时候，各有选择。有人把重点放在对丑恶的揭露和批判。我们的选择是在浊世中寻找清流，在雾霾中寻找亮点。这和揭露批判知识界的丑陋，异曲同工。

那小群原来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兼做口述历史。涉足丹青纯属偶然。孙女今年8岁，喜欢画画。小群和儿媳也陪着她涂涂抹抹。儿媳感觉老少都有画画的兴趣，就买了些绘画材料和教材。小群出于好奇，按照教材尝试画了几张，最初并没有摸到门道。尝试依据照片，为我们二人各画一张肖像，也不满意。2018年8月到甘肃旅游，我们从敦煌坐火车回京，乘同一包厢的是画家杨金鹏夫妇。车行三十多个小时，我们天南海北地闲聊。小群说起自己偶试素描，杨金鹏愿意看一看。用手机展开习作，杨金鹏便从透视原理讲起，给小群上了西洋素描的第一课。

2019年元月，小群找出一张她母亲中年的黑白照片，扫描后，用A4纸打印出来，以一比一大小，画到8开纸上，家人看了，都说挺像。接着用同样办法，画了一张她父亲的素描，家人也说像。这就提升了画画的信心。她为家人和周围熟人画了十来幅，部分习作感觉还不错。

2019年春节，邻居吴文越来家小叙。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术设计，小群趁机向她请教。吴文越说，要注意把握好黑、白、灰的关系，小群颇受启发。吴文越的先生陈跃在中央美院任教，小群又请他指点。陈跃讲了构图的基本要领和忌讳，还借我们一些画册，让小群茅塞顿开。

小群继续依据照片素描，不少朋友给予热情鼓励。经济学家贺阳看到给他画的肖像，说：“小群67岁学画，短短几个月就能够达此水准，那么我们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许多东西也完全可以大胆地去学、完全可以试着去做！至于达到什么水准、什么境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敢于去尝试，要愿意去享受尝试过程中的乐趣。”

进一步提高素描技艺，有赖于专家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方面，有VI幸得到李斌和沈嘉蔚两位老友的悉心指导。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名家。最初，小群觉得自己初学乍练，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但他们在微信上看到小群的习作，既对优点有鼓励，也对缺陷及时指谬。好在铅笔素描可以修改。此后，小群不时将新作通过微信请他们过目。他们具体的指点，常收点石成金之效。

后来，我们参加纪念郭小川诞辰百年座谈会，又结识了画家罗雪村。他以文坛人物速写名世，文章也很老道。他把我们的图文配视为同道。由此，小群又得一名家指点。王端阳夫人是画家孔继华，小群习画也得到她的热心指导。

小群画画虽然时间不长，也想追求自己的风格。造型艺术门类很多。像小群这样退休以后才开始学画，一般都是学水墨画，山水花鸟、梅兰竹菊，适宜陶冶性情，但不易形成风格。小群选择了铅笔人物素描，主要是画人的头像。追求的风格可能有别于一般美术院校的师生。他们画人物素描，喜欢选择天真的儿童、纯洁的少女、憨厚的老人、朴实的农民、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百姓。小群画知识界人士，他们的精神特点是思考和批判，所以首先选择适合表现知识分子气质的照片。思考者多数都是忧郁的气质，少见满足的笑容。如果说有一些特色，或许就在这里。

老朋友陈远焕定居大洋彼岸，在微信上看了我们的图文配，介绍给新朋友罗慰年。罗先生热情相邀，让我们编辑成册，由博登书屋付梓。承罗先生的美意，我们赶快将已经成稿的图文配整理一番，又经宋以敏、智效民、陈为人、丁宁、蔡静等热心朋友帮助我审稿纠错，编成现在这个样子。其中肯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还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丁东、邢小群 2020年9月

【序跋】

《毛泽东的政变——文化大革命简史》前言

纵 纬

写给那些被人为阻断了解文革全貌和真相的人

——作者题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首开中国文革课，报名者几近千人，以致哈佛没有这么大的教室，不得不动用已具文物价值、只有重大庆典时才肯动用的Sanders剧院。

从那个时候起，麦氏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已有二十余年。也产生了一个令中国人脸红的说法：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海外。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中国言论控制逐渐收紧，文革研究已成“苦活”（香港大学丁学良教授语）：资料难找、关系难建、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然而，在文革研究表面凋零下，民间

的文革研究却日渐生机勃勃。一个省的文革史，一个单位、一所大学的文革史被陆续挖掘，形成一股愈压愈旺势头。

应该说，1966——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迫害人数最多、手段也最为残酷的一次反人类罪行，受害者大大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及希特勒的迫害犹太人。早就应该受到国际法庭乃至全人类审判的罪行，却因中共的继续执政而被庇护了下来。某些西方左派学者还天真的把文革视为毛泽东的伟大创举和理想主义的试验，即使失败也是悲壮的，令人啼笑皆非。近年来又由于中国跛足改革所造成的不公，令中国一些底层民众——尤其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重新举起了毛的旗帜，呼吁对文革重新评价。这一切都说明：普及文革的真相，让人明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最真实、最隐秘的动机，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时刻。

而当我们面对文革整个进程，既惊叹它的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铺天盖地而来，奔腾呼啸而去；又困惑于它的云谲波诡，扑朔迷离——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从整体上讲：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上演这样一幕历史大剧？毛泽东为什么要彻底摧毁中共、这个自己还担任着主席的党？为什么要将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权打碎，推倒重来？他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从具体进程上讲：毛既然可以按他本人所言“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为什么还要发动这样一个运动——导致经济停滞、全面内战——来实现他的愿望？最初“亲密”无间的毛林关系，何以会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反目成仇、不共戴天？一向唯毛之命是从的周恩来为什么后来成了毛的眼中钉，几欲除之后快？在党内从无对手的毛，怎么最终（实质上）败在了周恩来之手？“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怎么会仿佛在转瞬之间又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在这令人迷惑的表象之下，有着怎样的内在逻辑？

文革自始至终高举着“反修防修”的大旗，但究竟什么是“修”？却始终是一个变幻不定的概念。刘少奇的“修”，是因为在饿死人情况下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助毛打倒刘的林彪不知何故后来也“修”了；周恩来因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几乎要“修”了；邓小平呢？因为不讲“阶级斗争”“修”了。赫鲁晓夫“修”在“与美帝勾结”，而毛本人与“美

帝头子”尼克松的“勾结”，远甚于赫鲁晓夫——毛为遭到弹劾的尼克松大鸣不平，还专门派一架专机把尼氏接到中国当面宽慰。

文革发动之初，笔者正上初三，已经开始关心时政。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整个过程。从1987年起，就立志尽力收集文革史料，力图解开文革被蒙上神秘色彩的各个事件之内幕，梳理出能够令人信服的脉络——既吻合文革从发动到逐次推进大的逻辑框架；又要尽己所能地诠释文革重大事件中的疑点，及其与文革整体框架、各个重大事件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尽己余生之力，描绘出一幅尽可能全面、真实的文革画面。

简史不是通史，难以面面俱到。笔者的立意更偏重于提供一个粗线条的文革轮廓，让那些没有经历文革，只能从不同的渠道读到一些支离破碎材料者，能够对十年文革有一个整体了解，或将所知的那些零碎的资料连贯起来。文革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不能留下空白！

【评论】

旁观新加坡国会辩论

——我眼中的新加坡（7）

于向真（新加坡）

2022年5月1日，我在北京的住家小区因逐日严格的核酸普查，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整个小区7栋楼全院被无预警封控，那12天别说离开北京，连楼门都出不去，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把之前买好的机票改签作废再买票，直到小区连续12天逐户查核酸再无一例阳性，解封后我们赶紧离京南下。

这次出国一年多来，我们老两口每晚都按时收看新加坡电视台的华语晚间新闻，半小时的新闻播报少不了转播当天国会现场情况，旁观新加坡国会辩论，一次次感动甚至震撼到我。不多占各位时间，这里说两件最近的事情吧。

前晚内政部第二部长向国会报告：“经调查发现（因去年涌入大批富商移民），新加坡房价快速抬升，造成xxx户低收入家庭为支付超负荷房租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内政部正在制定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补贴这些家庭xx万现金援助。”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底层贫困者的及时雨啊！联想疫情三年，新加坡政府经常性针

对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发钱发物，多次惠及包括我这样的长居非公民者，其中给低收入家庭水电费的优惠政策保持至今未取消。社会的公平性、国家管理的温暖度正是在这种状况中美酒般荡漾。

再举一例，前几天我看到有议员在国会发言时说，他走访社区时，发现有些热心公益人士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到社区养老所帮扶老人，出钱出力给老人送温暖，有人无偿做陪护或清扫，有演员得空去和老人一起唱歌等等。该议员向国会提议：这些无私为老人做贡献的人，也应该得到社会关爱，政府应出台政策慰问并奖励关爱老人和弱者的人，这样不仅鼓励善人善事，更有利激励更多人投身公益事业。在老龄化迫近的当下，这份建议多给力啊，赢得会场一片掌声。这件事也让我受到感动，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5年，我热心参政议政，利用业余时间写过那么多两会提案，周末搞社会调研，夜晚赶写提案，艰辛劳累全凭觉悟与执着。这样为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建言献策，与名利绝缘，结果源源不断遭白眼、受奚落，接连获得的最佳或优秀提案奖，几乎全被代提交者据为己有，通常连告知我一下都省略掉，做好事遭恶报没有讲理的机会。

牢骚两句，话题归正。偶尔也能看到相当激烈的国会辩论场景，比如最近有人质疑两位部长租住洋楼事件，新加坡对以权谋私的贪腐采取的是零容忍对策，李显龙总理刚听到质疑，马上委托反贪局彻查。一连串严格审查的结果刚出来，副总理兼统筹部部长张志贤随即在国会公布，紧接着部长与议员们相继发言，有人进一步证明尚穆根和维文两位部长的收入完全有能力支付这项正常的房价支出，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部长住小楼会让住组屋的平民感觉不爽。那天为此事国会辩论竟长达五个小时，反对党领袖不依不饶发出责难。会后前进党议员断章取义将国会辩论过程发布在社交平台个人账号上，误导读者认为政府走过场。次日的国会上，总理公署部长兼财务、教育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女士义正辞严地当面批评该议员误导舆论的不当行为，那位反对党领袖难以辩驳，只好先同意尽快撤下不当言论，英兰妮执意要求他向社会公开做出道歉，最后他理屈词穷，不得以才同意尽快做出道歉。民主政治这番尖利的场景，令习惯两会全票通过的观察者瞠目结舌。

一年多旁观国会辩论，使我了解到新加坡在男女平权方面的突出表现，难怪前些天看到一份国际组织公布的最新“性别平等调查”结果，新加坡位居亚洲第

一，日本几乎垫底。新加坡 30 多位高级部长中，经常在电视新闻中露面，在国会上发言的女部长、女议员不下十多位。女部长中有三人身居核心要职，肩负重任，美女部长很少，博士女部长倒不少。至今还没发现一例因性贿赂进入政界的女性，因为所有议员都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新加坡国会现场还有一个现象也挺有趣，国会会场是阶梯式的，议长坐在主席台中央，会场中间是主讲台，两侧的座位最前排一侧居中座位，通常坐的是总理李显龙和准接班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以及各大部部长，另一侧中间坐的是工人党（目前最大的反对党）秘书长毕丹星，毕丹星是位律师出身的年轻政治家，他领导的工人党在 2020 年大选中斩获佳绩，从铁腕般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手中赢得新的获胜选区。我注意到国会辩论现场，毕丹星一场不落，大胡子的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很少发言。另外，前进党党魁也逢会必到。我想，有反对党瞪圆眼睛地深度参政，人民行动党再厉害再占优，也不敢须臾放松，更不能放肆，必须时时事事认真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讨民众欢心。

旁观新加坡国会辩论，帮我认识到新加坡的管理特色是在细节上力求完美。因为不可能完美，所以孜孜以求，这个过程挺感人的。

2023.7.8

【评论】

“状告海关案” 跟进报道 (81)

——该为谁而战？

李南央（美）

这个月，接到一位正在美国教学的，研究中国文革学者的电邮，她的的问题是：最近在写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对你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重读了您在《纽时》上发表的“怎么办啊？这个党”这些文章，李锐先生谈到“毛病不改，积恶成习”，能否理解成他用这 8 个字概括中共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您最清楚他讲这些话的背景和个中原因。您的理解是什么？我的判断是他的论断应该不但与他对文革和 1949 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矛盾的归因有关，而且与经历文

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一代执掌中国的各种不足，从而影响党的前景和命运有关，不知是否偏差太大？非常感谢您！

我回复她：

首先，这句话是民间谚语，不是我爸的发明，但他确实是认同的。

你好像应该有《敬祭李锐》一书，内中郭于华教授的短文《记一次研讨会》：

“对李锐先生敬佩已久，但接触有限。印象颇深的是在《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的出版研讨会上李锐老的发言……

在为该书举行的小型研讨会上，李锐老提出：今日中国需要探讨的是如何不再出毛泽东的问题。有如天问，振聋发聩；至今仍在耳畔回响，仍在脑海萦绕。”

这应该是对父亲认同那句话最好的诠释。父亲一直以为“四千人大会”邓小平以“宜粗不宜细”终止了对毛的清算是绝大的失误，因为文革后没能对毛进行彻底的清算，所以其后的各代：邓、江、胡、习，都沿袭了毛泽东的衣钵，到习修宪后，成为世袭的皇帝，将毛泽东的旗帜一直打下去。现在则是在全世界实现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共产主义必定战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好时机——美国在奥巴马垂帘听政下，撤销边境，终止能源自给……仅只两个月已然危机四起，国将不国。

有趣的是，相隔几日，又接到远在德国的学者王维洛先生的电邮，他是这样写的：

记得1996年在美国碰到两位同班同学，他们争吵一个问题，如果中美开战，他们的儿子将为谁而战，当时他们都已经入美国籍，儿子都在上高中。一个说，为中国而战，因为祖上是中国人；一个说为美国而战，因为入籍时宣誓过的。现在在一个支持民主党，一个支持特朗普。

我回复他：

维洛，你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中国心”支持拜登，“美国心”支持川普。也就是说，拜登办的事儿对中国有益，川普办的事儿对美国有益。

两位学者的来电似乎并不搭界，其实有着紧密相连的内涵。那就是，在中国，因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习近平依然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在祸国殃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只不过坐在车里的人中真诚跟随者寥寥无几，睡着者或装睡者一个挨着一个。反观美国，因没有对上世纪六十

年代在本土出现的“红卫兵思潮”的深刻反省，那一代自以为不当红卫兵是没有良心，成年后还当红卫兵是没有脑子的人，已然充斥美国精英阶层。他们那颗崇拜中国毛泽东的初心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为美国教育出几代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事实摆在这里：BLM 运动发起人之一的 Patrisse Cullors 女士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崇拜列宁、毛泽东。这个运动在民主党主政的城市已形成席卷之势。拜登任命的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的父亲 Joseph Buttigieg 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这位部长刚刚上任就宣布要对货运司机的行驶里程课税，其集权大政府的恶行众目昭彰。以偏概全自然不对，但是以这两人背后的势力和对美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压迫而论，目前“中国心——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心——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角力确实到了生死关头。那些已入籍美国的，曾经是中国人的华裔美国人，到了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该为谁而战？！

父亲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中有这样一段话：

到巴西、美国的那次考察，应该说是大开了眼界，不仅仅是看了他们的水电事业，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好，建设也好，社会文明的程度也好，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全方位的了解。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

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我认同父亲的结论：“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对于违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拜登政府，美国的“独立宣言”告诉我们：“人们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参见本文引录栏）。美国不存在“煽动罪”，参加1月6日华府游行的美国人是爱国者，加在他们头上的“企图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罪名纯属无稽之谈。☞

2021年3月31日

*这段引言是我根据美国《独立宣言》如下原文翻译的：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

【怀人】

朱陆真

张保和（美）

刚刚李丽林同学告诉了我朱陆真同学因病逝世的消息。听到后，非常悲痛。朱陆真是我在博氏幼儿园和王府大街小学的同班同学，从三岁到十三岁，有十年同窗之谊。不但如此，朱陆真家住在迺兹府那条街上，而我们家住在迺兹府街上的北官场胡同，两家非常近。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朱陆真的家。因为住得近，我的父母和朱陆真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姥爷一家也都相识。



以上是我们在博氏幼儿园的毕业照。地点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前段台阶上。左边的老师是麻老师，右边是园长。下面是我能认出的后来去了王府大街小学的同班同学：第一排从左至右：2：曹凯玲（后离开），4：张宝珍，5：张保和（作

者），9：潘抒；第二排从左至右：6：李建生，9：方伟（后去武汉），10：陈和言，11：林勋多（后离开）；第三排从左至右：3：国继平，7：朱陆真，9：赵伦，13：李丽林。

路队

关于朱陆真，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和她在一个路队和学习小组。在小学时，为了交通安全，班里的同学被组织成四个路队，在放学后，一道回家。因为王府大街小学位于王府井以北，东四大街以南，往王府井方向走的就是南路队，往东四走的是北路队，中路队是往学校对面黄图岗胡同里走的。还有一东路队，包括住在报房胡同里或更东边的同学。因为住得近，朱陆真和我是在同一个路队，南路队。除了我和朱陆真外，南路队还有陈和言、刘继宏、国继平、张宝珍、金恒茂等。朱陆真是一个小队长，同时也是路队队长。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要排着队走路。记得有一个时期里，好像是在除四害运动中，每个同学还都要带一个苍蝇拍上学，随时随地用来打苍蝇。有时我们这些男生队员不好好排队，还用苍蝇拍互相乱打，成心跟朱陆真捣乱，弄得她很生气。

在同一路队的同学基本上也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下学后大家一起做功课。我们的学习小组都在朱陆真家做功课，所以我对她家印象很深。她家的院子极大，以前肯定是一座王府。朱陆真的外祖父是当时北京的名牙医朱砚农。在我的另一篇名为《迺兹府》的短文中，曾提及北京凡有头脸的人物当年都找朱砚农看牙。这话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当时中国麻药的有效性有限，也不是经常使用，所以看牙经常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听说朱砚农的技术极佳，拔牙一点不疼，但他的价钱也非常不菲，当时拔一个牙的价钱是一百块钱。而那时一般人的月薪也就是五六十块钱。尽管如此，那些有条件的人还都找他看牙，可见他的医术之高明。我记得她家门前经常停着几辆使馆的汽车（从车牌能看出来），可见各国住北京的外交官也找他看牙。我也听说朱砚农拔牙不痛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从外交官那里弄到外国的麻醉药。

我们家的有些亲友也找朱砚农看牙。看完牙后，因为离着我们家很近，就顺便来我们家坐一会或吃中饭。因为和朱砚农家住得近，我们家还多了一些客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家从来没有找朱砚农看过牙，因为父亲虽然是高薪，一百块钱拔一个牙的价格还是太贵了。

朱砚农是山东人，记得朱陆真曾说过她的姥爷是七八十年前一位成功的北漂。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朱砚农并没有受过完整的医科教育，而是自学成才。不管他的教育程度如何，后来达到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如果他真是自学成才的话，他的才华，勤奋就更不一般了。

我对朱砚农的印象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微胖，头发有些发白的老人。在六十年代里，他应该是有六十多岁了。朱砚农有两房太太。大太太是朱陆真的亲姥姥，可是朱陆真称她“姥娘”，我们也都跟着这么叫。同班同学程光茂家里也是山东人，解释说将“姥姥”叫作“姥娘”是山东人的一个习惯，他家里也这么叫。二太太年轻很多，个子高高的，非常漂亮。她在诊所里当护士，给朱砚农打下手。朱陆真称她为“姥姥”（在以后的文字中就称朱陆真的亲姥姥“姥娘”，她姥爷的二太太“姥姥”）。“姥姥”好像没有孩子，所以朱陆真的母亲朱宣和是朱砚农唯一的第二代。显然，朱陆真跟了她母亲的姓。我一直以为朱陆真是朱家唯一的第三代，不想最近李丽林同学告诉我在朱陆真十五岁时，那就是1965年里，她又有了一个妹妹，取名陆续。

朱陆真的姥爷、“姥娘”、“姥姥”说话都有些山东口音，但人都非常和气，尤其是她姥爷总是面带笑容。朱陆真的母亲是协和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接触不多，有时在迺兹府街上看到她骑车而过。朱陆真的父亲名为陆瑶海，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老师，我也应该是见过，但已经忘记他的长相了。朱陆真的姥爷太出名，大家对她的父母反倒不注意了。

其实，朱陆真的爷爷也是一位大人物，语言学家陆志韦。他从1934年至1952年任燕京大学校长，后遭到批判、迫害，于1970年过世，享年七十六岁。

1949年后，朱家的前院的大部分被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占了，还有一部分用于做朱砚农的诊所，里院是朱家的住宅，院子里有两棵大杨树。记得到了秋天，院子的地上有一堆堆的杨树叶，我们曾钻到树叶堆里玩。杨树的树叶很大，树叶上的梗很粗也较长，隐约记得我们叫它为“老条”。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个游戏就是两个人一人手里拿一根杨树叶梗子，左手拿着梗子的一端，右手拿着另一端。然后将两人手里的树叶梗子相互套起来，往相反方向拉，看谁的梗子不断。

我小时候较木讷、听话，被认为是那种较老实的孩子。现在中国的文化是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是个神童或至少学霸。如果现在说哪个孩

子老实，恐怕就是贬义的了。可是我小时候的文化和现在很不一样，大家当然喜欢聪明伶俐的孩子，但也不排斥听话、老实的孩子，所以我小时候还很讨大人的欢喜。朱陆真的姥爷、“姥娘”就挺喜欢我的。她姥娘经常给我的一个特殊待遇就是在学习小组结束后，让我一个人留在她家里多玩一会，所以我对她家里很熟悉。想起来，我还是非常幸运，生长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如果到现在的话，凭我的木头脑袋瓜，就肯定不那么吃得开了。

朱陆真的家是我在中国所看到过的布置最考究的家。一般四合院的北房都是客厅，朱家也是如此。但她家有两个客厅，一个中式的，一个西式的。中式客厅里当然是一套红木家具，包括八仙桌，椅等，而西式客厅里则是一套沙发，加之一架钢琴。那时钢琴也是非常稀少的物件。中式客厅和西式客厅中间还有一道厚厚的帘子，可以将两个客厅隔开。

文革

文革中，朱砚农当然也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等等。一家人从他们的大房子轰出来，搬到近迺兹府东口一处小了许多的住宅。最重要的是，他的诊所也被取缔，他也不能行医了。朱砚农的病人大都被整肃，而那些外国外交官也没地方看牙了。我也记得文革初期看到朱砚农在迺兹府街上扫大街。

1968年1月，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学校复课，我被分配到了灯市口女中（当初称东方红中学）八班，而朱陆真也是去了灯市口女中，被分在一班，和李建生、潘抒同班。从那里，我于1969年8月去了内蒙兵团，不久后，朱陆真也去了东北兵团，和小学同班同学李建生、金孟珏、王秀荣在同一个连队，位于黑龙江省萝北县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十五团二十二连。我在地图上查了查，萝北县位于现在的鹤岗市以北，和俄罗斯接壤，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最偏远的地区。

文革中上山下乡完全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一种犯罪。我们班里有些有先见之明的同学，如程光茂、于允靖、唐兆京、金恒茂等，托病在家，拒绝服从，成功地躲过了这场灾难。但是当时逼迫下乡的压力巨大，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顶不住压力，懵懂而去，折羽而归，白白遭受了起码六七年的无妄之灾。而上山下乡对女生来说，更是艰难，因为她们要忍受几乎和男生一样的艰苦劳动和生活。

我们班里有很多家庭条件很好的学生，文革前在家里都是娇生惯养。而朱陆真在这些人当中条件又是最好的。一旦去了农村，我们这些本来的小姐、少爷并

没有退缩或逃跑，而是和其他的青年一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可以说，我们在劳动和其他各个方面都没有落后于他人。据李建生回忆，朱陆真种过菜，养过猪，还开过拖拉机。她在1976年才回到北京，在东北生活了七年之久。

在我们生长的五六十年代里，政治上特别强调热爱劳动。我们这些家庭条件好，不需在家里做家务事的学生经常受到数落，被批评为懒惰，五谷不分，四肢不勤等等。但是后来我们这些人的个人成长表明，小时候是否做些家务事和将来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都在努力地学习、工作及生活，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朱陆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970年我们家搬去了阜外大街单位宿舍，从此离开了居住了十七年的迺兹府。1973年又搬到了月坛北街。我后来于1975年回到了北京，但因月坛离迺兹府很远，也很少回去了。所以和朱陆真及班里其他的女同学就很少见面了。

1977年11月恢复高考，朱陆真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家庭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来说，高考不仅是提供了继续学业的机会，也是对我们及我们的家庭多年所受到的迫害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及平反。对我来说，大学的两年多的时间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想象，她的感受应该和我的非常相似。

1978年夏，班里一些同学和我们的五六年级王景英老师一起游北海，其中大多数是刚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的同学。以下是那次大家在九龙壁前的一张合影。



在以上相片里，从左至右，李丽林（北京医学院），潘抒（北京外国语学院），金孟珏（天津医学院），寿乐英（北京经济学院），王老师，程光茂（北京医学院），龚居安，张保和（北京经济学院），朱陆真（北京师范大学），赵伦（南京邮电学院）。

奋斗

1982年大学毕业后，大家进入工作岗位，并结婚生子，开始了家庭生活。这一段生活对大家来说都应该是相对平静。本来朱陆真可以继续她在中国平静的生活，但她选择去拥抱变化，拥抱一个全新的生活：1993年她们全家移民美国。

1993年朱陆真移民美国时，她已经四十岁了。一般来讲，移民越年轻越好，因为在适应新环境，语言学习等方面，年轻都有巨大优势。另外，美国是个自由社会，没有人给你封顶，可也没有人给你兜底，一切全靠自己！开餐馆是很多中国移民的谋生途径，但开餐馆竞争激烈，创业相当艰辛。朱陆真从小一定吃得很好。当时北京最好的山东馆子翠华楼就在八面槽，和朱府近在咫尺。作为山东人，她家肯定没少去那里。她对饮食的了解应该对开餐馆有一定优势。但开餐馆也需要在时间、精力、体力等方面做出巨大付出。朱陆真创业成功显示了她的能力、智力及奋斗精神。当初我们当中最娇生惯养的一个后来竟然成了最有冒险精神，创业精神的一个，这真是有些让人始料未及。

朱陆真从1993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的生活，可能用“奋斗”这两个字来形容。但多年创业的辛劳，加之充斥餐馆厨房里的油烟，一定都对身体有害。

我于1980年去了美国。虽然同在美国，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在大约2010年，我和朱陆真在美国通过一次电话，聊了很久，得知她早已结婚生女，在得克萨斯州开饭馆。我记得问了关于她姥爷家的一些情况。朱陆真说尽管受到严酷迫害，她姥爷非常想得开，对财富及一切看得都很淡。看起来，她姥爷不但在医术上造诣非凡，在精神上也是一位非常有修养、超脱之人。朱陆真还提起在他的晚年里，他还询问过我的情况。她的姥爷在90年代里过世，享年应该过了八十岁了。后来朱砚农的一个侄子成了北京牙科医院的院长，继承了他的牙医事业。

后来听说朱陆真于2012年患肺癌，在以后的年月里，一直在与疾病斗争。她也从美国搬回了北京。听说药物治疗对她有效，可将病情控制住，让我很欣慰。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2017年春，我从美国回国探亲。期间赵伦等在北京咸亨酒店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大家相聚甚欢。席间我坐在朱陆真旁边，聊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那次她的精神状态很好，让我觉得她的情况应该非常稳定，但现在看来那只是表象。她的坚强、乐观掩饰了她的病痛、艰辛。



以上的相片是那次聚会中同学们在咸亨酒店所摄。其中从左至右，第一排，刘文山，郭振华，张保和（作者），陈和言，于允靖；第二排，龚允谋，龚居安，寿乐英，朱陆真，李丽林，赵伦。

我刚刚从李丽林那里得知，朱陆真的“姥姥”，即朱砚农的二房太太，一直和朱陆真住在一起，至今还健在，已经近一百岁了。我母亲生于1923年，她应该和我母亲岁数相仿，是我们上一辈中极少还在世的人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在下次回国时去拜访她。

友谊与文化

我父亲在世时常说一句话：世界上几乎什么都是新的好，就是朋友是老的好。的确，友谊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同学虽然后来不常见面，但从小建立的友谊没有因为时间，距离而被忘却，疏远，反而更加宝贵。

在外面闯荡那么多年的经历使我体会到小学同学这个群体是和我在文化上最相近的一个群体，因为大家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如相同的生长环境～北京东城，相同的生长时代～五六十年代，同校～王府大街小学，同班～六一班，同老师～张老师，曹老师，王老师等，有些还是同幼儿园，甚至相同的家庭背景。我们的友谊还包括了我们的家人之间的友谊，如兄弟姐妹之间，甚至父母之间。总之，同学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无处不在，但是又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将其具体化，形象化。可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是什么，而在我们身上又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呢？这可能是一个很有

意思，但也很复杂的话题。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

我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北京文化。北京是个文化古城，北京的居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很讲究礼数，性格都较温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一定会受其影响。

另外就是从民国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的父母及老师都在民国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49年后，政府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但文化改造需要时间，不是一天半天能完成的。起码在我们生长的五十年代里，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观念，如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等，在我们身上也一定也有所体现。在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中，中国传统文化被毁坏殆尽。当时充满暴力的社会对我们绝对有很大影响，但家庭的影响也不会完全消失。

再有就是基督教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所上的学校，王府大街小学及博氏幼儿园，在1949年以前都是教会学校，我们的老师也都是基督徒。在1949年后，她们当然不能提及她们的信仰，但她们的行为，举止一定会对她们的信仰有所反映，也一定会对我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1949年以前的一二百年中，基督教在中国从事传教、慈善及教育事业。我们的母校，王府大街小学的前身，培元小学，就是由第一个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贝满 (Bridgeman, 1801 ~ 1861) 的夫人 (Eliza Jane Bridgeman, 1805 ~ 1871) 于1864年建立的，是北京，也很可能是全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949年后，教会学校被取缔，但通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是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隐形的受益者。基督教的影响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群体一个非常特殊的共性。

由于我们的共同文化，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性格上都有诸多的共同点。诚然，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及性情都不尽相同，友谊再深，也不可能都有完全一样的性格特点。我只是想找出一些我们之间在性格上的最大公约数。以下是我所能够注意到的两个。

第一个可能就是不管男女，我们在性格上都偏向于内向，且较温和。我们之间出了诸多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但鲜有口若悬河、大腹便便的商人或指点江山、趾高气扬的官员。但不得不说由于我们内向的性格，大家的胆

子可能都也比较小，尽量不去招惹是非，所以也不容易出那些特别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物。

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在生活上也都较自律，有节制。举例来说，中国男性中抽烟喝酒者为大多数。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由于上山下乡，如果说十之八九的男性都抽烟喝酒，应不为过。而我们班的很多男同学则逆社会潮流而动，烟酒不沾。据我不完全的统计，这包括陈和言、赵伦、程光茂、李建生、刘文山和我自己。我们这些人从十六岁以后就各奔东西，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机会相互影响。但在一些生活习惯上又如此之相近，我不得不将其归咎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在以上的这些特征中，我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影响到痕迹。

终 点

继俞建章在2020年5月去世后，朱陆真是我们中间第二个离世的人。他们的过世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随着他们的去世，我们友谊的终点，我们自己生命的终点正在悄然向我们走来。幼时，时间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盼望着时间快一点走，好快些长大。而现在，时间已经成了我们的敌人，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兽。在它面前，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挡之力，只能任其宰割。而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珍惜我们的每一分钟，多吃一些对己，也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并尽量保存一些记忆。

人死后，是像唯物主义者或无神论者所说的那样，生命完全消失，或像有神论者所相信的那样，灵魂可去天堂或地狱，还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生命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呢？我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回答，只有在身临其境后才能知晓。只是一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和现在这个世界的沟通渠道一定不甚畅通，否则我们前面的人早就做了。

记得我曾问过朱陆真博氏幼儿园的朱老师与她家的关系，得知朱老师是她的一个姨，朱砚农的一个侄女，也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在山东传播很广，朱家一家很可能都是基督教徒。我猜测朱砚农本人也很可能是通过教会受到的教育。不知道朱陆真从小有没有受过洗。即使没有，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也会受到很多基督教的影响。

按照基督教义，如果朱陆真受过洗礼，她就是一基督徒，现在就应该在天堂里。不管她在那里，希望她安息。只要我们这些同学中的任何人还在这个世界上，

或甚至到了另外的世界，我们都会永远怀念她。如果我将来和她又在同一个世界巧遇，我希望还再做她的路队队员，并且会尽量不给她捣乱了。☑

【书摘】

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刘瑜

为什么人会作恶？这恐怕是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最经久不息的问题之一。无数学术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学者们内部的文字游戏，但是，“为什么人会作恶”，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得邪恶”这个问题，却翻越了学术的高墙，成为令几乎所有人着迷的大众话题。

人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卢旺达大屠杀、达尔富尔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会有火刑或者凌迟，而所谓“群众”会去津津有味地围观这些酷刑？为什么战争过后，胜利方会活埋几十万的俘虏？为什么会有奴隶制？为什么 ISIS 会把砍头拍成录像，再放到网上去传播？等等。我们之所以着迷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话题本身的重量，而且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邪恶不是一两个独裁者所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参与。令人惊悚的是，在另一个时空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友，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

“平庸之恶”

在所有关于人类邪恶的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恐怕是德国纳粹对 600 万犹太人的屠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了两百年之后，发生在诞生了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等伟大人物的德国。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腹地，人会突然变成野兽？某种意义上，过去 70 多年，人类从未真正从对这一邪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我们一遍遍地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去解释这种荒诞的邪恶，解释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其中，但是解释完之后我们又总是感到不满足，又不断去寻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对它的解释，这种理解本身也构成对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断浮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个理论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概念——平庸之恶。大家可能知道，这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概念，用来形容一个叫作艾希曼的纳粹党人。事实上，她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或许，分析艾希曼这个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作恶”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探测当下的自我和那个潜在的邪恶自我之间的距离。

谁是艾希曼？这是德国纳粹党中的一个中层官员，虽然职务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关键——他负责整个帝国的“犹太事务”，相当于“党卫军犹太事务办公室主任”。第三帝国早期的犹太政策是强制驱逐，而不是屠杀，那时候艾希曼主要负责组织犹太人的驱逐和财产没收，后来帝国政策转为所谓的“最后方案”，也就是集中营毒气室杀戮方案，他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送到集中营去。

作为一个反犹的枢纽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说罪大恶极，理应作为战犯被审判。但是，“二战”之后，他神秘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展开了对他的审判。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审判中，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参加了庭审，并记录了她的观感。这就是那本书的由来。

为什么阿伦特用“平庸之恶”来形容艾希曼？因为她通过观察发现，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么天性残忍、头脑扭曲的变态狂魔，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伦特的原话来说，艾希曼身上充满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 vacuousness*）。精神医生对他的分析报告也显示，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心理或精神疾病，对工作、对家庭，甚至颇有责任心。在其逃亡过的小镇里，人们记忆中的艾希曼是一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还时不时帮助邻居维修各种器械的“暖男大叔”。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在他的叙述里，他既不是这场屠杀的编剧，也不是它的导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演员”而已。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平庸之恶”。这种恶不需要创造性、戏剧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谓“恶之花”的美感，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

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在她看来，无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在艾希曼的眼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传达一些信息，执行一些命令，怎么就成了杀人犯了？他反复强调：“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事实上，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然而，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 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 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 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 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 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 0.001% 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 100% 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 0.001% 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 0.001% 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集体作恶的 1+N 模式

这也正是“平庸之恶”最惊悚的地方。我们发现，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

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然而，邪恶真的仅仅是“平庸之恶”吗？当张三的“不假思索”和李四的“不假思索”，还有王五的“不假思索”……彼此相连，就会形成汹涌澎湃的邪恶吗？还是，或许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各自的蒙昧，而是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是权力，巨大的、失控的权力。

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藐视民众的概念，乌合之众、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贪婪、愚昧。其实，此类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解释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个乌合之众的概念，可是为什么到了2015年，德国人成了整个欧洲最欢迎难民移民的博爱主义者？难道德国人的基因突变了吗？显然，真正变化的不是德国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个“一”。

其实，我相信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谓“坏人”，构成“暴民”的基础，但是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

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纳粹一上台，其国家暴力的特性就显露无遗。1933年，纳粹开始推行所谓抵制运动，冲锋队四处出击，禁止德国人进入任何犹太人经营的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诸多行业从业。1936年开始，对经济体系进行所谓“雅利安改造”，直接剥夺犹太人

的财产。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数百个犹太人被杀，数千个店铺被烧毁，数万个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有了这一切的铺垫，1941年后对犹太人的强制隔离居住、1942年后实行所谓“最后方案”，就水到渠成了。

这些暴力或暴力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的震慑，我们不难想象。“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况，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这是权力制造暴民的第二个台阶。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伦特对他的描述里，艾希曼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还是当权力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1932年，纳粹党赢得大选之际，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纳粹的安全部门。这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之后，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不断获得升职，成为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事务”的第一执行人。到最后，党卫军的“犹太人事务管理办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办公室”。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

以说一事无成。虽然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是学习不够用功，也可能是不够聪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由于长了个犹太人式的鹰钩鼻，他从小还是小伙伴们们的嘲笑对象。从职业学校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汽油推销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又被解雇了。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其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到最后，艾希曼的正式职务并不是很高，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处级或厅级干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权力巨大。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儿、留在哪儿，他往往具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从1939年开始，就有报纸称艾希曼为“犹太人的沙皇”。

一个犹太人这样记录艾希曼当时留给他的印象：“艾希曼进来了，像一个年轻的神。他那时很帅，高大，黝黑，闪闪发光。他的行为也像是神——他决定着逮捕或者释放谁，取缔或者放行某个机构，创办或者审查某个犹太人报纸，甚至最终，决定着谁能动用犹太人的银行账号。”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没有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他是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

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 nobody 变成 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

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

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翻译软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纳粹的种族淘汰论简直愚不可及，德国人怎么会接受如此荒诞的意识形态？但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主义并非完全不可思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全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但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不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

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

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暴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

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个体的恶或许乏味，但是集体的恶从来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权力的指挥棒在呼风唤雨，而燃料则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所点燃的激情。也就是说，艾希曼或许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不假思索”，在高压、在利益面前，他始终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而动听的意识形态则给了这种计算一个合理化的外衣。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的“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选自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jiyi.bjb@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